

世變下士子撰史的多元意蘊

——試論屈大均《廣東新語》之化外深意*

林宜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摘 要

本題以明末清初屈大均 (1630-1696) 晚期著作《廣東新語》為核心研究文獻，探討此書在地域、物質及經世致用的實學意義外，還蘊含了精神式的「化外」深意。

所謂「化外」，係指始於敘述者進行「內／外」區辨，終於「納外為內」之文化施教意圖。主由二大面向進行論述——「體例類目」以及「敘述特質與話語策略」。首先與三種舊本《通志》類目對照，掌握〈外志〉敘述觀點與地位變化，以呈顯《廣東新語》體例之「奇」與「新」；其次，異於博物誌、類書之白描，《廣東新語》多有「說話者」涉入，強調「自我存在感」與「身分認同」，間或紀虛不紀實，並善用遺民「隱語」，其旨趣之多元可能，亦於焉開展。

文末引他作以建構互文式的化外論述，勾勒「南方偏霸」之文化認同，論者或由此得窺世變士子撰史之多元意蘊。

關鍵詞：世變，《廣東新語》，屈大均，化外，偏霸

* 本文係科技部專題計畫「鬼神・蠱厲與災異——試論屈大均《廣東新語》之化外深意」(MOST 106-2410-H-003-121) 研究成果之一。初稿宣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合辦之「明代文學與文化研討會」(臺北：2018 年 6 月 2 日)，後經大幅修改投稿。承蒙諸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01long99@ntnu.edu.tw

一、緒論：重新省視世變下士子撰史的多元意義

自國亡後，諸遺佚多扞文網，大均忽釋忽儒，又喜任俠，往來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挈涕過之，而嶮然自拔於塵垢之表。¹

夫士志不素定，不足當世變；世百變而志不與之俱，彼其人固有自知自信者在也。²

十五歲即經歷黍離悲痛的世變，一路走來「忽儒，忽釋，忽游俠，忽從軍」，³已過半百的屈大均（1630-1696），在參與吳三桂軍隊三年後，知其終將無成，遂於1676年毅然決然地辭去監軍，放下奔走多年的抗清行動，⁴返鄉定居，轉而著書立說。1683年鄭克塽（1670-1707）降清，所有具體的復明事業，正式宣告無望。是年，大均在廣州城南得屋數椽，築「三閭書院」，⁵將歷年手稿集結刊刻，付梓行世。綜觀屈氏一生著述多達三十餘種，⁶流離動盪中而筆耕不輟，其中《翁山易外》、《廣東新語》、《有明四朝成仁錄》、《翁山文外》、《翁山詩外》凡五種，合稱「屈沱五書」者，⁷即刊刻於此一晚年時期。⁸相對於從軍抗清的具體行

¹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板藏真逸寄廬民國六年（1917）刊本），卷1，〈屈大均傳〉，頁27。後出之屈傳，多據此增益。

² 吳道鎔，《澹齋文存》（新北：文海出版社，1975），卷2，〈屈翁山先生墓碑〉，頁64。

³ 汪宗衍，《屈大均年譜》，收入屈大均著，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8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屈大均年譜引言〉，頁1849。本文徵引屈大均《廣東新語》、《翁山文鈔》、《翁山文外》等，以及汪宗衍《屈大均年譜》、《後譜》，皆出自《屈大均全集》。首次引用時標示收入全集之冊數，再引簡省。

⁴ 考屈大均一生參與抗清活動事蹟，始於甲申事變後三年（1647），年方十八，即從業師陳邦彥「獨當一隊」。之後1659年三十歲，與魏畊共謀參與張煌言起義事。後於1673年四十四歲，接連三年間「自粵北入湘從軍」、「與吳三桂言兵事」；然而自1676年「謝桂林監軍」，攜家返沙亭後，就未見有參與抗清之載。同前引，頁1859、1877、1924-1925、1929。

⁵ 屈氏在此奉三閭大夫屈原畫像於其中，足見其用心如此。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翁山文鈔》，卷1，〈三閭書院倡和集序〉，頁284-285。又見汪宗衍，《屈大均年譜》，頁1949。

⁶ 朱希祖，〈屈大均（翁山）著述考〉，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8冊，「附錄三」，頁2136-2163。

⁷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翁山文外》，〈翁山文外自序〉，頁1。

⁸ 康熙二十四年（1685），屈大均五十六歲，以家有老母及總集諸作之因，婉謝吳興祚、王士禎之疏

動，立言行世以祈藏諸名山，成就千秋大業，⁹ 則顯然是另一場跨越時空的紙上抗爭，看似寧靜無聲，但字裡行間卻是暗潮洶湧，甚或波瀾壯闊。諸作於後世轉相復刻，流布行世，更猶如空谷足音之迴盪不已。¹⁰

回顧屈大均一生的外在身分，或因顛沛流離而時有改變，然誠如吳道鎔(1852-1936)所撰碑誌之論定，¹¹ 斯人內心「固有自知自信」之志，方能抵擋世局百變之濤濤洪流。抗清諸事與認同堅持的鮮明色彩，更使得屈作在雍、乾大興文字獄時，¹² 屢遭禁厄，史載甚至議及開棺剝屍。¹³ 此種浩劫的確讓屈氏諸作一時間「銷聲匿跡」，但嘉、道後文網稍弛，民間書坊便應時重刊，屈作遂又重現江湖。¹⁴ 「禁毀」後的「傳播」現象，¹⁵ 尤以晚清詩人龔自珍(1792-1841)之夜讀詩為世人所稱美。道光元年(1821)某日，龔氏在夜闌人靜時覽讀屈作，¹⁶ 深有所感地寫下「靈均出高陽，萬古兩苗裔。鬱鬱文詞宗，芳馨聞上帝」、「奇士不可殺，殺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讀，讀之傷天民」二詩，¹⁷ 他似礙於任職清政府內閣中書的身

薦。後康熙二十五年刻《翁山詩外》、《翁山文外》；康熙二十六年刻《廣東新語》、《翁山易外》。後又參與《廣州府志》、《安定縣志》等地方史志之纂修。黃廷璋，〈翁山詩外序〉，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頁1；汪宗衍，《屈大均年譜》，頁1957、1961、1964。

⁹ 屈大均於1687年的書信中，表述自己對於刊印諸作的深切期許：「僕之千秋大業，其可傳之其人者，惟《詩外》、《文外》；藏之名山者，惟《易外》；若《廣東新語》則亦一奇書也。」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翁山佚文〉，〈復汪栗亭書〉，頁482。類近文字又見屈大均，《翁山文鈔》，卷9，〈答汪栗亭書〉，頁406。

¹⁰ 據汪宗衍考訂，自屈大均卒後(1696)，分別在1697、1699、1700、1701、1705、1710、1715、1738、1747、1749、1753、1802、1810、1814、1820、1868、1907、1910、1916、1920、1929、1940、1948等年，皆有作品被選入集，或重刻行世，足見後世閱眾源源不絕。汪宗衍，《後譜》，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8冊，「附錄一」，頁1996-2013。

¹¹ 吳道鎔，《澹齋文存》，卷2，〈屈翁山先生墓碑〉，頁63-65。

¹² 據朱希祖考訂：雍正七年(1729)、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四十一年，皆大興文字獄。朱希祖，〈屈大均(翁山)著述考〉，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8冊，「附錄三」，頁2137。又見《全集》前言所載：清人李宗顯《禁毀書目均編》列舉屈氏之《翁山詩集》、《翁山詩外》、《翁山文鈔》、《翁山文外》、《翁山詩略》、《翁山易外》、《道援堂集》、《寅卯軍中集》、《四朝成仁錄》、《廣東新語》、《廣東文集》、《登華記》、《嶺南三家詩選》等，皆遭禁毀。歐初、王貴忱，〈前言〉，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頁10。

¹³ 汪宗衍，《後譜》，頁2000-2001、2007。

¹⁴ 其後如1868年南海陳氏重刻《嶺南三大家詩選》；1907年新陽陳鳳藻刊《明季北都殉難記》、《明季南都殉難記》(為《四朝成仁錄》之一部分)等等。同前引，頁2010-2011。

¹⁵ 塔娜，《清代文學傳播個案研究——屈大均詩文集的傳播與禁毀》(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

¹⁶ 龔氏所閱屈作版本為何，不得而知，然前一年(1820)，廣州書坊才復刻了屈氏《道援堂詩集》及《廣東新語》。時龔自珍還留滯蘇杭一帶，或可能閱目此版。汪宗衍，《後譜》，頁2010。

¹⁷ 龔自珍著，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第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辛巳詩三十

分，¹⁸ 而必須以「隱語」為之；¹⁹ 然字裡行間卻毫不保留地讚揚屈大均的人格與作品，甚至以「天神」來向其節操表達高度崇敬。當年「悖逆」案之咄咄逼人，終將隨日久而雲淡風輕；而後世閱眾，循由強調弦外之音的「隱語」密碼，解讀賦義，時而有「曠世相感」之歎。²⁰

民國初期，屈大均之相關傳記與著作，更為廣東清遺民如吳道鎔、陳伯陶(1855-1930)、梁鼎芬(1859-1919)輩所關注。林志宏認為，此種積極纂輯地方史志，包括遺民敘寫如《勝朝粵東遺民錄》等，²¹ 以及復刻明遺民禁毀諸作的舉措，其大旨乃在託寓家國之思，並假此建構自我認同；²² 有趣的是，上揭地方史傳之明遺民如屈大均者，弔詭地成為清遺民表述家國認同的符碼；而這種易代遺民之「接受」現象，實不斷提醒後世閱眾如你我，在重讀屈大均時，是否應更自覺地尋繹反思、抽絲剝繭，對那些當年不可明說的「隱語」，進行解碼、闡述賦義，從而揭示其背後的文化意圖？

九首」之〈夜讀《番禺集》，書其尾〉，頁455。

¹⁸ 據樊克政考：龔自珍於1820年會試落榜後，即以舉人通過「捐納」取得內閣中書一職，然並未立即赴官。次年道光元年，方就任內閣中書，後赴北京任職國史館校對，校修《大清一統志》。遲至1829年始中進士，官至禮部主事。又，家族中祖父、父親、胞弟皆為仕清官員。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49、169、178、181；郭延禮，《龔自珍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64、66。

¹⁹ 「靈均」暗指屈氏，而「番禺集」指屈作，雖屈大均並無以此命名之作，此顯然因政治避諱而採用之「隱語」。筆者由龔詩「高陽苗裔」、「靈均」、「番禺」等關鍵字詞推敲，考屈大均嘗於〈姓解〉一文自言「吾為帝高陽之苗裔」，又引友人陳子升〈屈道人歌〉「僧伽未必非靈均」一句深得其心；此外〈維帝篇〉亦自述其血統「我祖從秦川，抱挾《離騷》經，肇居番禺偏」亦足佐證。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0，〈姓解〉，頁174-175；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翁山詩外》，卷2，〈維帝篇〉，頁40。

²⁰ 此語援引自張學華描述汪兆鏞對於明遺民的追慕崇敬。張學華，《閣齋稿》（廣州：蔚興印刷場，1948；後收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民國輯逸》第100冊，新北：大統圖書，2009），〈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頁53。

²¹ 此書共四卷，為陳伯陶所撰，前有吳道鎔序：「凡此皆吾粵數百年來醞釀潛蓄之正氣，不幸值世變而於諸君子一爆之，蓋積久而不可遏也。」足見陳氏作傳之因，乃在認同遺民們能於世變中能堅守正氣。除屈傳外，尚有二百九十多名遺民見錄。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頁1。相關研究見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2016）；趙雨樂，《近來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香港：三聯書店，2017）。

²²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

如此說來，有關明遺民傳記，或遺民所撰寫的地方史志，往往不單純是人物事蹟或風俗民情的客觀載記而已，此間極可能存在了家國認同與集體記憶的層層建構，至少為三段歷程：始於遺民本身的自我建構，以及歷經清朝禁毀時期之地下傳播過程，乃至於民國以降之清遺民有意「假此喚醒志同道合者的歷史記憶」，所衍生的各式文化「再現」。²³ 執此反觀屈大均晚期所撰史志，尤其是《廣東新語》，其文本意義之多元與複雜，遂變得極為有意思。

誠如學者陳永明所考，無論是「為故國存信史」，或是「為萬世植綱常」，²⁴ 清初明遺民撰寫史志或參與地志修纂，雖因易代戰亂之肅殺戾氣而多所顧忌，但比起後來雍乾文字獄時期，氛圍卻是相對寬鬆的。筆者以為，屈大均適符其例；而《廣東新語》相較於屈氏他作之流傳，尤為特殊。這在 1700 屈大均卒後一年刊行本之前序中，潘耒 (1646-1708)²⁵ 即已直陳差異：

先生著書凡十餘種，其《四書補註兼考》，與何東濱共成者，殊有功於經傳，雖經鏤板，未行於中州。其《成仁錄》表章盡節諸臣，尤有裨世教，惜未大成，僅有稿本藏於家，將就泯滅矣，獨此書流行。²⁶

屈氏諸作在當其時，或尚未成書，或未及刊刻而有泯沒之危者，唯獨《廣東新語》一書，「禁而不止，代有傳刻，其後更是重刊不絕。」²⁷ 這意味著，此書在消費傳播及閱讀接受的文化意義上，較之他書來得更有影響力。筆者甚至認為，屈大均自詡「奇書」²⁸ 的《廣東新語》，其廣泛流播，並非純為際遇之偶然，此中必另

²³ 諸如汪兆鏞四下「訪求明遺老書畫，不惜重價」。張學華，《閩齋稿》，〈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頁 53；又如 1981 起由清遺民吳道鎔等人纂修《番禺縣續志》之舉。前此，屈大均並無傳記流傳，故屈傳係「再現」於此一時期。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 59、167-168；塔娜，《清代文學傳播個案研究——屈大均詩文集的傳播與禁毀》，頁 13。

²⁴ 陳永明援引司徒琳 (Lynn Struve) 的觀點，認為戴名世《南山集》案於 1711 年發生，意味著康熙以來寬鬆政治氣氛的結束。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清初的南明史書寫〉，頁 105-148。

²⁵ 屈大均亦嘗與潘耒交遊。吳超，〈屈大均、潘耒與石濂交往關係考論〉，《東方論壇》，3（青島：2010），頁 100-105。

²⁶ 潘耒，〈廣東新語序〉，收入屈大均，《廣東新語》，頁 1-2。

²⁷ 歐初、王貴忱，〈前言〉，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 1 冊，頁 12。

²⁸ 屈大均，《翁山佚文》，〈復汪栗亭書〉，頁 480-482；《翁山文鈔》，卷 9，〈答汪栗亭書〉，頁 406。

有玄機。值得追問的是，世傳此書，尤其是仍在清朝政權之下，透過地方史志之貌似無害於政治的「安全偽裝」，究竟有何「深意」包藏其中，方得於民間一再重刊、輾轉流傳，為一群隱性的閱眾所接受？再者，倘若遺民與閱眾之間，的確存在著「一套隱語系統」，²⁹ 而這樣的話語策略 (discourse strategy) 與文學隱喻 (metaphors)，³⁰ 是否也可以在屈大均《廣東新語》一書中，找到相應的符碼與例證？

針對易代之際特定政治氛圍下的禁忌話題，筆者承續多年來的學術關懷，擇選屈氏晚期撰寫的史料「類方志」³¹——《廣東新語》，藉之以梳理遺民入清撰史的諸多意義。基於研究之便，筆者先掌握史志中常見的政治符碼，即篩選此書有關鬼神、巫蠱、疫厲以及災異等暗黑敘述，繼而考掘書中隱而未顯的奧言底蘊。經初步考察發現：除了史學界較感興趣的地域、物質、社會經濟以及「經世致用」的實學意義之外，³²《廣東新語》一書實蘊含了多元的文學隱喻與精神式的「化外」深意。³³

究竟何謂「化外」？簡而言之，係指始於撰述者進行「內／外」區辨，終於「納外為內」之文化施教意圖而言。令人意外的是，有關《廣東新語》的「化外」論述，在過去的屈大均研究中，從未曾以專題進行探討。回顧歷來學界關注的面向，主要有二，其一為屈大均生命樣態之研究。諸論基調大致不離其遺民身分之多樣性，故於逃禪、遊俠、從軍等生命歷程，分別有所闡釋，當中尤以廖肇亨、嚴志雄³⁴為佼佼者，筆者得其啟發甚多。其二，為屈大均諸作之研究。史載屈作多達

²⁹ 余英時特別留意明遺民之間，可能存在著一套隱語系統；這種相應於高壓迫討、貧困交迫等諸多艱難處境，所發展出來深具隱喻的語彙系統，係透過隱晦周折如雙關、避諱等話語策略，表達幽微曲衷。書中論證方以智乃在惶恐灘投江殉死，而世傳「疽發背而死」之說法，當作「造反」隱語解，實為易代遺民傳達心曲的特殊方式。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臺北：允晨文化，1986）。另，有關易代政治高壓氛圍下的語言表述特質，王汎森亦嘗撰專書專章，考探清代大規模的文字獄。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2014）。

³⁰ 詳參雷可夫 (George Lakoff)、詹森 (Mark Johnson) 著，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北：聯經出版，2006）。

³¹ 因此書係有關廣東的地域書寫，本於數本方志，然體例上卻迥異於方志，故以「類方志」稱之。

³² 魚宏亮，《知識與救世：明清之際經世之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³³ 之所以稱為「精神式」，是因為相對於具體操作的流程而言。

³⁴ 廖肇亨，《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臺北：允晨文化，2008）；廖肇亨，《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嚴志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1（臺北：2002），頁 43-87。

三十餘種，研究者多青睞詩、詞、文，僅少數著眼於經學及史籍。後者如朱軍明、張秀蓉、劉必琪³⁵等文，分別就版本、篇目、思想三面向，提出基礎而紮實的歸納與闡述，唯所論皆著重社會經濟、物質文化等具體層面，且偏向經世致用的實學理解，對於書中有關災異之政治託寓、藉古論今之話語策略，以及家國認同等文學隱喻，則闕而不談。³⁶倘退而求其次，就文獻之部分徵引來說，當代明清研究者對於《廣東新語》一書，並不陌生。諸如巫仁恕之言「葵田」、³⁷胡曉真之言「粵歌」，³⁸乃至於劉燕萍之言「淫祠」者，³⁹唯皆就「地方史料文獻徵實」的角度而運用之，聊舉數則而未遑全書專論。由此看來，有關《廣東新語》一書的研究，仍存有不少發揮空間，留待後之論者開拓。

職是之故，本文選擇了屈大均研究中向來被文學界所忽視的史料筆記——《廣東新語》（後簡稱《新語》），作為核心文獻，然切入角度則有別於前述社會文化史所著重之具體物質載記，則是更明確地針對此一作品中之文化意圖，尤以地方暗黑史（如鬼神、巫蠱、疫厲及災異等）為要，探討其蘊含之「虛」或「想像」的文學隱喻及話語策略，如前揭問題，所謂納「外」為「內」的「化外」深意，如何在全書的類目架構、各部選材與詮釋，以及屈大均自我話語的「互文」(intertextuality)中，⁴⁰或明或隱地，以各種書寫姿態多元展現？

³⁵ 朱軍明，《屈大均經世致用思想研究》（廣州：廣州大學碩士論文，2011）；張秀蓉，〈論《廣東新語》的經世之學〉，《東吳歷史學報》，7（臺北：2001），頁53-83；劉必琪，《屈大均與廣東新語》（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³⁶ 筆者嘗撰文專論易代遺民災異論述與家國隱喻。林宜蓉，〈妖異、魑魅與鼠孽——明清易代攸關家國之疾病隱語與身分認同〉，收入中央大學明清研究中心編，《物我交會——古典文學的物質性與主體性》（臺北：萬卷樓圖書，2017），頁331-381。

³⁷ 巫仁恕徵引《廣東新語》卷十六〈器語·蒲葵扇〉之例。巫仁恕、王大綱，〈乾隆朝地方物品消費與收藏的初步研究：以四川省巴縣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9（臺北：2015），頁1-41。

³⁸ 胡曉真言及《粵風續九》，徵引《廣東新語》卷十二〈詩語·粵歌〉以證。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從峒中跳月到天下輿圖〉，頁69。

³⁹ 劉燕萍徵引《廣東新語》卷六所言的「紅娘」和「綠郎」，來談論《夷堅志》中「淫祠」所衍生的「鬼交」現象。劉燕萍，〈淫祠、偏財神與淫神——論《夷堅志》中的五通〉，《淡江人文社會學刊》，35（臺北：2008），頁39。

⁴⁰ 此處援引了當代西方文化評論中的「互文」性，藉此說明諸文本之間的交互指涉，並互為補充說明，形成一意義網絡。因此，本文亦多方參佐屈氏諸作，如《翁山易外》、《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相關論述，以作為《廣東新語》中隱語與符碼之補充說明。當代學者如胡曉真，亦假此方法研究女性彈詞小說的寫作及閱讀過程文本間的多元關聯。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2003），頁32。相關學理可參蒂費納·薩瓦納約(Tiphaine Samoyault)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王瑾，

全文主要由二大面向進行論述——「體例類目」以及「敘述特質與話語策略」，假此以重新探討《新語》撰述旨趣之多元可能。蓋屈大均於自序中首揭：「吾於《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⁴¹ 可見本書創作之初始動機，在於裨補《廣東通志》之不足。故本文首先將《新語》與三本明嘉靖至萬曆間刊行的《廣東通志》，進行比對，由「體例類目」見其「新」「奇」之處；其次，進一步解析其敘述特質與話語策略，從而佐證本文論述觀點：認為《新語》不僅僅為地方之博物百科，在風俗文物記載之「存信史」意義外，猶且更有深層之旨趣，即屈氏亟欲假「著書立言」以「植綱常」。具體來說，此書實深具時代性之政治隱喻，並飽含儒者胸懷天下、期許未來王道盛行、終將「化外」的奧言底蘊。在論述過程之中，除了藉此反思《新語》補闕之消極意義外，最終將由屈氏諸作中，交互指涉、縱橫編織地建構出一套積極的「化外」論述；此種「類方志」之撰述旨趣與書寫模式，亦將豐富學界對於世變士子撰史現象之研究視域。

二、《廣東新語》與撰述旨趣之再探

綜觀翁山所撰史志數本，多在晚期。

除了在康熙二十六（1687）刊刻《新語》外，其後又多次參與編纂《廣州府志》、《定安縣志》、《永安縣次志》。⁴² 在此之外，還有專類人物傳記數本，多載貞烈忠孝者，例如《皇明四朝成仁錄》、⁴³《永曆遺臣錄》。足見其亟欲書寫歷史，建構地方知識，以傳諸後世的用心。⁴⁴

《互文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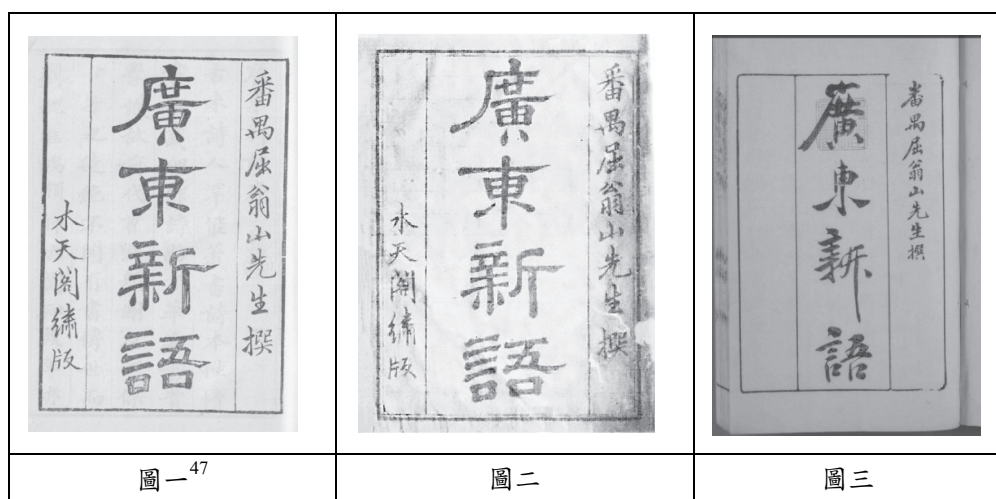
⁴¹ 屈大均，《廣東新語》，〈廣東新語自序〉，頁3。

⁴² 陳澤泓，〈廣東名家修志錄（三）〉（http://www.gzsdfz.org.cn/was5/web/detail?record=101&channelid=298252&templet=gznj_detail.jsp），2018年9月18日下載。

⁴³ 屈大均由三十歲開始一直到晚年都在撰修此書，但最後還是未完稿。後由葉恭綽在四〇年代羅致世傳諸抄本，輯校為十二卷書稿，成《廣東叢書二集》，今收入《屈大均全集》第3冊。歐初、王貴忱，〈前言〉，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頁15。

⁴⁴ 諸作傳世狀況不一，今僅《永安縣次志》、《皇明四朝成仁錄》以及《廣東新語》可見，其餘《永曆遺臣錄》僅留存目，《廣州府志》、《閩史》亦不傳。

至於《新語》之成書時間，根據南炳文的考察，最早不得超過康熙十九年(1680)，最晚為康熙二十六年。⁴⁵ 於今可見版本，則以清康熙三十九年木天閣繡本為最早，後印本有誤為「水天閣」者，係重刊於雍正、乾隆、道光、光緒年（重要版本一覽參見圖一至圖三）。⁴⁶ 至於近年印刷的點校鉛印本，則以《屈大均全集》本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出版）較佳。其餘尚有廣文書局本（1978 年出版）、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臺北新興書局 1979 年出版，係鉛字排版本，參考價值甚低）等，唯校勘未盡精確，僅聊供參佐。



⁴⁵ 南先生根據卷二十八〈怪語〉所載黃賓臣事例考訂，推翻汪宗衍《屈大均年譜》中所考《廣東新語》成書為「康熙十七年」的說法。南炳文，〈《廣東新語》成書時間考辨〉，《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重慶：2007），頁 74-75。

⁴⁶ 經筆者比對考察，學生書局 1968 年影印刊行本，上則有「木天閣繡版」，應比較接近初刻本（圖一）。屈大均，《廣東新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又臺大圖書館藏有十冊本，首頁有「水天閣」繡版，除「木」作「水」外，其「版」字之「捺」筆，也與「木天閣」本有「出鋒」與「反捺藏鋒」之別，當為後來乾隆時期之重刻本，而非最初版本（圖二）。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古籍室藏本，計二十八卷，共八冊。經查並未有「木天閣繡版」字樣。屈大均，《廣東新語》，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木天閣繡版。至於早稻田大學藏本，前雖有康熙三十九年序，但未註明出版者及出版地，筆者疑其為後出而流傳海外者（圖三）。屈大均，《廣東新語》，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5/ru05_03051/ru05_03051_0001/ru05_03051_0001.pdf），2018 年 9 月 30 日下載。此外，尚有《續修四庫全書》清康熙木天閣刻本、《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本；電子資源則見：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清康熙木天閣刻本。

⁴⁷ 臺灣學生書局所影印發行的版本封面，卷首有「清聲閣書籍印」白文章。

筆者依研究之便，擇選《屈大均全集》第四冊之《新語》為主要依據，再輔之以學生書局影印康熙三十九年木天閣繡版，進行勘誤。此一《屈大均全集》本，係由近人李默點校，鉛字排版印行，⁴⁸ 所據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收藏之康熙三十九年（1700）木天閣初印二十八卷為底本。本題即據此本為核心研究文獻，依次展開系列問題之探討。

（一）「旨趣」藏在細節之一：體例類目之「奇」與「新」

本節首要之務，在探討屈氏自詡《新語》為「奇書」之因。而究竟「奇」在何處？倘相較於方志通例，則見其特殊之處為何？又，自序中清楚交代此書係承續舊本《廣東通志》而出「新」，那麼，所謂「新」之具體指涉當為何？「新語」與「外志」之類目，又如何巧妙吻合？此種吻合，又有何深沉託寓，直扣全書旨趣？

蓋《新語》之「奇」與「新」，首在體例類目。

既承舊志而來，而採用之體例類目，卻與方志通例迥異，可謂非常奇特。依常理推論，屈大均所參與編纂的地誌不少，自當熟稔於舊志通例，援例照辦，實最為方便。正如其所纂《永安縣次志》，⁴⁹ 即採方志通例，全書類目依次為「建置、都里、山川、古蹟、學校、賦役、兵防、祠祀、官師、名宦、選舉、人物、烈女、風俗、物產、寺觀、藝文」等共十七卷，可謂符合標準範示。然屈大均在撰寫《新語》時，卻強調與舊本《通志》有別，其命名為《新語》，即意在標舉「新」之特出也；再者，觀其分類之細目與編排，捨通例而另創格局，獨樹一幟，則為「奇」之所在也。嚴格來說，《新語》一書，其命名乍看像是地方史志，⁵⁰ 然則實際上卻不符合傳統通例，故筆者姑以「類方志」名之。

多數研究都如此介紹《新語》：全書共二十八卷，每卷記述某類事物，「凡廣東之天文地理、經濟物產、人物風俗等，無所不包」，⁵¹ 可謂博雜並陳，包羅萬象，故有「廣東百科全書」之美譽。這顯然並非浪得虛名，我們可由全書體例類目，得一概觀，並以此為論述基礎：

⁴⁸ 據筆者考查，此本雖方便，然仍有訛字，標點亦多錯誤，需謹慎檢核。相關版本見歐初、王貴忱，〈前言〉，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頁17。

⁴⁹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6冊。

⁵⁰ 這可由叢書分類察知：大部分人皆將此書理解為史料、地理類，如《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皆列入史部，而中華書局歸之於《清代史料筆記》。

⁵¹ 歐初、王貴忱，〈前言〉，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頁8。

表一：《廣東新語》類目一覽表⁵²

卷次	類目	內容
卷 1	天語	28 條目。記載廣東天文氣候，包括日月星辰、風雷雨水的狀況，以及雲霧瘴癘之發生與影響。
卷 2	地語	42 條目。記載廣東地理位置、重要地標、村莊聚落等。
卷 3	山語	49 條目。記載廣東境內山嶺峽谷及山中勝景。
卷 4	水語	70 條目。介紹廣東的江河湖潭與泉井潮汐情況。
卷 5	石語	25 條目。記載廣東著名石景及重要礦石生產，如端硯等。
卷 6	神語	22 條目。記載廣東一地民間崇祀之淫祠、正神及越地特有之巫祝習尚。
卷 7	人語	27 條目。記載廣東歷來文事、武事知名的賢能之士，以及孝順長壽者。
卷 8	女語	29 條目。記載廣東特殊事例的婦女。
卷 9	事語	50 條目。記載廣東地區的文教風俗。
卷 10	學語	10 條目。記載廣東地區的學派與學者。尤以陳白沙為首。
卷 11	文語	30 條目。記載廣東的文章典籍。
卷 12	詩語	18 條目。記載廣東的詩人詩社與民間歌謠。
卷 13	藝語	7 條目。記載廣東書畫琴藝與玉石瓦器等技藝。
卷 14	食語	29 條目。記載廣東食物。
卷 15	貨語	25 條目。記載廣東物資。
卷 16	器語	36 條目。記載廣東器用。
卷 17	宮語	22 條目。記載廣東重要建築物。
卷 18	舟語	12 條目。記載廣東可見之各式舟舫。
卷 19	墳語	27 條目。記載廣東著名陵墓。
卷 20	禽語	30 條目。記載廣東各式禽鳥。
卷 21	獸語	24 條目。記載廣東各式走獸。
卷 22	鱗語	25 條目。記載廣東各式魚類。
卷 23	介語	22 條目。記載廣東各式甲殼類。
卷 24	蟲語	35 條目。記載廣東各式蟲類。
卷 25	木語	83 條目。記載廣東各式植物。
卷 26	香語	11 條目。記載廣東各類香料。
卷 27	草語	73 條目。記載廣東各式草本植物。
卷 28	怪語	8 條目。記載廣東地區的鄉野傳奇。

表一係根據張秀蓉一文整理，筆者由其所列諸項推斷：撰者研究角度係著重民生物質及社會經濟，故歸納此書時，特別注重地方文物風俗，而謂之「記載」。

⁵² 張秀蓉，〈論《廣東新語》的經世之學〉，頁 59-62。

然而，誠如前揭問題，屈大均撰寫《新語》之動機，在客觀「記載」文物之外，極可能蘊含更深層的文化隱喻。筆者在此提出一個推論，並追問：倘遺民士子如屈大均者，欲透過撰寫地方史志以「存信史」及「植綱常」，那麼，他究竟運用了何種話語策略，進而委婉託寓攸關家國認同之「化外」深意？

這在中國史學傳統中，實有脈絡可循。古典歷史敘事除了強調「史實」的明確性之外，亦推崇敘述之隱晦與多義，如劉知幾《史通》所言歷史敘述，有繁筆有晦筆，晦筆為「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而「用晦之道」在於「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⁵³ 即指意在言外、弦外之音的極度發用。其所「略」而減省者為何？其所舉而「詳」者又為何？皆透露了史傳「說話者」的意圖，由是以觀屈大均《新語》之詳略有別，尤饒富興味。

依屈氏自序所言，《新語》之撰寫係據《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⁵⁴ 由此確知：屈書撰述動機，初始為裨補舊志之不足。在此之上，將衍生的二個子題：首先，屈氏所見之《廣東通志》，版本可能為何？其次，屈大均《新語》相對於《廣東通志》，究竟增補了什麼？省略了什麼？如此具體析論，讀者方可了解此書命名為「新」之由來與實質指涉。

經筆者考察，屈大均所見之《廣東通志》，應為流通於晚明至清初的版本，於今可見者，大致有兩大系列，現皆收入《廣州大典》叢書之中。⁵⁵ 其中一個系列，共有三本，內容係先後相續：⁵⁶ 起始為戴璟修、張岳等纂《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四十卷，首一卷；⁵⁷ 其次為黃佐纂修《嘉靖廣東通志》七十卷；⁵⁸ 再者為陳大科、戴耀修，郭棐等纂《萬曆廣東通志》七十二卷。⁵⁹

⁵³ 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 22，「敘事」，頁 161。

⁵⁴ 屈大均，《廣東新語》，〈廣東新語自序〉，頁 3。

⁵⁵ 此叢書為廣州市廣州出版社於 2015 年出版。有關此一叢書所收珍稀海外廣州文獻的內容、價值與存藏情況之考察，可參王蕾、沈津主編，《〈廣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獻書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⁵⁶ 三種舊本《廣東通志》乃接續而為，鐵證在第三種郭棐本之卷首，同時納入《初稿》戴璟序、舊《通志》黃佐序。此外，《初稿》首創之〈分野〉類目，亦沿用至黃佐本。

⁵⁷ 戴璟修，張岳等纂，《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廣州大典》第 35 輯史部方志類第 1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

⁵⁸ 黃佐纂修，《嘉靖廣東通志》，《廣州大典》第 35 輯史部方志類第 2-4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

⁵⁹ 陳大科、戴耀修，郭棐等纂，《萬曆廣東通志》，《廣州大典》第 35 輯史部方志類第 5-6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影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1602）刻本）。又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97-198 冊。

至於另一個系列，為清人金光祖修、莫慶元等纂《康熙廣東通志》三十卷。⁶⁰經考：其體例類目多以清政府職官藩屬為依，與《新語》無甚關聯；而全書卷末之「外志」，又幾乎延用前一系列材料，實無需再納入本文討論之列。

由此推論，屈大均撰寫《新語》時所寓目的舊本《廣東通志》，當以明中葉至明末流傳的第一系列之可能性極高。又，《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凡例明示「廣東舊無通志」，⁶¹換言之，除此系列，並無其他《廣東通志》可供參照。在初步確立參照本後，筆者為避免大海撈針的困境，採取了掌握關鍵線索的研究策略：根據屈大均書序自言《新語》係舊本《通志》之「外志」，研究者除據此了解其具有《傳》之於《經》的補充功能外，當可進一步合理推論，《新語》主要內容，即類同舊本《通志》「外志」。那麼，自應以舊本《通志》「外志」，作為一關鍵線索，觀察新舊之間其承續補充與詳略之別，則可有效掌握《新語》之撰述旨趣。

為了比較之便，茲將三種舊本《廣東通志》之類目，條列於表二，舉凡「外志」之內容，另立一欄標識之：

表二：三種《廣東通志》類目一覽表

	書名／總卷數／編修者／ 版本	卷別／目次	
第一本	《嘉靖廣東通志初稿》 四十卷，首一卷 戴璟修，張岳等纂 明嘉靖十四年 (1535) 刻本	卷首 卷 1 卷 2 卷 3-34	「凡例／圖經」 「分野／山川（上）」 「山川（下）」 「政紀」、「行次」、「疆域」、「形勝」、「封國」、「古蹟」、「沿革」、「坊都」、「秩官」、「公署」、「循吏」、「名宦」、「人物」（宦蹟、將畧、卓行、忠義、流寓）、「學校」、「道學」、「風俗」、「科貢」、「禮樂」、「卹典」、「神祠」、「戶口」、「田賦」、「課料」、「差役」（以下略）

⁶⁰ 金光祖修，莫慶元等纂，《康熙廣東通志》，《廣州大典》第 35 輯史部方志類第 7-9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1675）修三十六年（1697）刻本）。

⁶¹ 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稿》第 1 冊，〈凡例〉，頁 12。

表二：三種《廣東通志》類目一覽表（續）

	書名／總卷數／編修者／ 版本	卷別／目次	
		卷 35 卷 36 卷 37 卷 38-39	「外夷海寇猖獗」 「生黎仙釋」 「祥異、舖舍」 「橋梁、宮室、陵墓」、「雜著」
第二本	《嘉靖廣東通志》 七十卷 黃佐纂修 明嘉靖四十年 (1561) 刻本	卷 1-63	「圖經」兩卷、「事紀」五卷、「表」五卷、「志」三十一卷（輿地、民物、政事、禮樂、藝文）、「列傳」二十卷
		卷 64-70	「外志」七卷：「仙釋」、「寺觀」、「夷情（上）」（蕃夷、海寇）、「夷情（中）」（徭獠、峒獠）、「夷情（下）」（俚戶、雜蠻）、「雜事（上下）」
第三本	《萬曆廣東通志》 七十二卷 陳大科，戴耀修，郭棐等纂 明萬曆三十年 (1602) 刻本	卷 1-13 卷 14-62 卷 63-65	「藩省志」 「郡縣志」 「藝文志」
		卷 66-72	「外志」七卷：「仙釋」、「寺觀」、「罪放」、「貪酷」、「番夷」、「猖獗」、「俚戶」、「雜蠻」、「倭夷」、「雜錄（上下）」

接下來，筆者據此探討屈大均《新語》與三種舊本《通志》在類目上的承續與創新，考其「先／後」、「主／從」、「內／外」、「詳／略」之安排，適足以映襯出《新語》如何「人棄我取」地「略其舊而新是詳」，從而了解其撰寫動機特殊之處。

以下逐本闡述其義。

首先，第一本《廣東通志初稿》，其目次由卷首之「凡例／圖經」、卷 1「分野／山川（上）」、卷 2「山川（下）」，以下之「政紀」、「行次」、「疆域」等等，皆繫諸國家政權之形成與職掌配置，自上而下，由「中央」而向「邊緣」拓展延伸。值得注意的是，由卷 35 至終卷 39，雖未以「外志」專名稱之，但與後二本《通志》之「外志」相較，即知內容性質之高度重疊也，是以本文納為比對內容，應無疑義。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通志初稿》之所以載入這些文化邊緣者（卷 35 以下），究竟是抱持著何種撰述觀點？我們可由卷首〈序〉文，得其大要：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其可馳諸至外夷、海寇、黎獠。曰聖人能內外無患，其衰也，戎寇生於門庭、於仙釋；曰《易》云：「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也。」不可惡者，道也；聖人不知不能者，亦道也。⁶²

明中葉進士倫以諒⁶³認為：蠻夷海寇之所以會被納入載記，不是因為他們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基於儒者聖人胸懷天下的宏大理想，即如《周易》所載：「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⁶⁴史料所載蠻夷諸事，看似繁賾雜蕪，然君子不應嫌惡之，這是因為聖人闡道追求普及內外，至於那些目前尚未通達的「不知」與「不能」，卻也是「道」存在之所。是以，撰史者書寫這些「不知」與「不能」，為的是未來聖人教化終將推遠至極的偉大宏願。如此由「內」而普及於「外」，想像式地勾勒「中國」未來教化所及的文化版圖，此種「外志」撰寫模式與觀念，在《初稿》中即為《廣東通志》的主軸與敘述基調，自然也貫串於後來在此之上增添綴補的兩本通志，甚且延及《新語》。

至於第二本黃佐纂修之《廣東通志》，其類目由「圖經」兩卷、「事紀」五卷、「表」五卷、「志」三十一卷、「列傳」二十卷，往下即為「外志」七卷。「外志」係由卷 64 至卷 70，佔全書七十卷的十分之一；且置於全書之末，內容頗為瑣碎雜蕪。

書首凡例說明「外志」分類用意：

「外志」首仙釋、寺觀者，以其為名教之外也；次詳書夷情者，依《廣西通志》例也。然分蕃夷、海寇、徭獠、峒獠、俚戶、雜蠻為三卷者，則因舊通志各從其類也。終以雜事者，凡《周禮》所謂「地隱」「方隱」，與稗官小說、神異、技藝，考證同異得失及有事相干涉、不可類附者，皆略，節書之。惟變異關係最大者，乃詳書。⁶⁵

⁶² 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稿》第 1 冊，頁 6。

⁶³ 陳大科、戴耀修，《萬曆廣東通志》第 5 冊，卷 25，「郡縣志·人物」，頁 652。

⁶⁴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7，〈繫辭上〉，頁 150-151。

⁶⁵ 黃佐纂修，《嘉靖廣東通志》第 2 冊，頁 20。

又「外志」五「雜事」類之前序有言：

昔楚史倚相能讀《墳》、《典》，仲尼刪之，以為《尚書》；而孟子猶於〈武成〉取二三策焉，矧畛域之外，耳目所未悉者哉！揚粵往乘多稀有瓊奇之事，如金鯉釣於趙胡，⁶⁶ 銅船駕於馬援，⁶⁷ 屈龍豢於蒲媼，鉅蝦辨於滕脩，⁶⁸ 殊駭見聞，最難縷數，徵諸陸賈楊孚之所述，袁宏裴淵之所記，以及稗官諸家，則漢晉之前已燦乎有聞矣！……固不可以其瑗瑣而廢之也。⁶⁹

「外志」之指涉，包括名教以外的仙釋、寺觀，以及邊境蠻夷族群，乃至於地方黑歷史如「地慝」「方慝」者，⁷⁰ 撰者皆考量其關係大局與否，從而決定要簡略交代或是詳加敘述。至於「雜事」類，尤為瑣屑卑猥，撰史者黃佐為表明採錄態度之嚴謹，特此徵引《左傳》、《尚書》以及孔穎達疏之典故，以孔子刪三《墳》五《典》而後成《尚書》，⁷¹ 而孟子對於《尚書》，猶且審慎地強調「盡信《書》不如無《書》」，僅僅從中取二三策為用，⁷² 遑論「雜事」這類「畛域之

⁶⁶ 明前期史志即載有「釣鯉臺」：「在清遠縣峽山寺西，秦人趙胡於此釣得金鯉，重百斤。」李賢等修纂，《大明一統志》，《中華再造善本》明代編史部第7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1461）內府刻本），卷79，〈廣東廣州府〉，頁11b-12a。

⁶⁷ 世傳「馬援銅柱」，典出李賢注引《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24，〈馬援列傳〉，頁839-840。

⁶⁸ 典出《太平御覽》：「王隱《晉書》曰：吳後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五尺，封以示脩，脩乃服。」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臺北：大化書局，1980，影印宋刊本），卷943，「鱗介部」十五「蝦」，頁4189。

⁶⁹ 黃佐纂修，《嘉靖廣東通志》第4冊，頁487。

⁷⁰ 所謂「慝」即「惡」也，故「地慝」，即泛指地方上的惡風惡氣惡水惡獸惡山惡路惡川也。王與之，《周禮訂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9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27，〈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頁457。

⁷¹ 典出《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稱讚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45，頁794-795。

⁷² 典出唐孔穎達的《尚書序》疏，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疏：「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並《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盡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尚書序〉，頁6-7。

外，耳目所未悉」之荒誕載記，豈能一概採信而載錄之？至於過往粵地所盛傳多不可勝數、駭人聽聞的故事，諸如秦趙胡鈞金鯉、漢馬援立銅柱，乃至於蒲嫗豢龍、滕脩辨鉅蝦等等，經撰史者考徵於陸賈《南越行紀》、楊孚《交州異物志》、袁宏《後漢紀》、裴淵《廣州記》等書，發現這些並非憑空捏造，而是早就流傳於漢晉之前的奇聞軼事，所以「固不可以其猥瑣而廢之」。由此可知，黃佐於「外志」纂輯那些稀奇荒誕、卑猥瑣屑的故事，雖已謹慎地徵驗群書，並且考量關係輕重，從而詳略有別，然而，基本上是抱持「存而不廢」、聊備一格，以供主政者參佐的消極態度。

至於第三本《萬曆廣東通志》類目，則以千字文為序，由「天地玄黃」至「陽」部共三十二部，細分為七十二卷，分別為「藩省志」（卷 1 至卷 13）、「郡縣志」（卷 14 至卷 62）、「藝文志」（卷 63 至卷 65）、「外志」（卷 66 至卷 72）。至於所謂「外志」之細目，較之前二本，增加了「罪放」、「貪酷」二類，大抵是為官致罪遭謫流放，⁷³ 或貪酷異常等社會邊緣人物。全書卷次之安排，與前二本類同，依政權單位鱗比而次；值得注意的是，撰史者將社會邊緣人物刻意「藏納」到「外志」類目之下，使得「外志」的涵括層面較前更廣，但也顯見「外志」之書寫地位，更趨於卑瑣、邊緣與黑暗。如〈凡例〉所述「夷情不可不備，故特詳外志」，⁷⁴ 又全書最末有〈論〉云「吾於地慝方慝，則紀人異物異，則紀理之所無，事或有焉，何容棄置也？倘觀者傲祿而修德，觸妖而思譽，涉險阨而知所趨避，則所謂禱者，豈不于人道少裨乎？」等，⁷⁵ 在在強調「外志」中所載地方黑歷史中的「惡」及「異」，包括人、事、地、物，甚或風俗、疾病等等，亦不離《周禮》所示，乃為了提供主政者能掌握夷情，警惕修德以趨吉避凶也，其核心撰述動機亦在此。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出二項重點：其一，三種舊本《通志》之「外志」所指，大抵是「教化以外」的流人、野蠻族群，或是仙釋道觀等非政治教化所及之處所與人物，亦多涉地方黑歷史之「異」與「惡」者。其二，三種舊本《通志》之詳略配置與敘述順次：「詳」的是政治權力中心統御的範疇。而其敘述的順序，則是延用傳統方志模式，以政權為中心，由「內」向「外」地，愈發簡略、益趨瑣屑

⁷³ 此類目下所舉例證，如唐武后時，有周興創大甕環炭以炙囚，最後因罪流放；舉凡「危宗社」、「賊仁賢」、「流毒蒼生」者書之，大抵是一些為官當權時用刑殘酷、荼毒蒼生的酷吏之類。陳大科、戴耀修，《萬曆廣東通志》第 6 冊，卷 68，「外志」三，「罪放」，〈論〉，頁 684。

⁷⁴ 同前引，第 5 冊，頁 26。

⁷⁵ 同前引，第 6 冊，卷 72，「外志」六，「雜錄（下）」，〈論〉，頁 840。

地，拓展及邊緣異文化，舉凡邊境之奇風異俗，或仙釋道觀等非政權所統攝之範疇者，則置於書末卷尾之「外志」。

執此反觀《新語》之「奇」與「新」，已昭然若揭。

極為明顯的，《新語》之體例類目，迥異於三種舊本《通志》詳略主從的配置。屈大均捨棄了地志書寫傳統架構，即以「詳筆」交代的有關政治範疇的類目，僅僅間或引述部分文獻；取而代之的是，採用前者在敘述中被邊緣化的「外志」，將原本在舊志中存而不廢、聊備一格的載記，擴充而為主要類目，並增益內容、詳加敘述，始於「天地山水石神」而及「人女事學文詩藝」，再次「食貨器宮舟墳禽獸麟介蟲木香草怪」而成全書架構。

就細目具體來說，如「五星倍於南斗」、「芝蘭湖」、「越巫」、「越祝」、「雞卜」、「黃野人」、「梅嶺」、⁷⁶「熒惑入南斗」⁷⁷等條目，原隸屬於舊本《廣東通志》之「外志」類以及「災異」類；到了屈大均《新語》，則分別成為卷1「天語」之〈星〉、卷4「水語」之〈二湖〉部分內容、卷9「事語」之〈永安崇巫〉、卷28「怪語」之〈黃野人〉、卷3「山語」之〈梅嶺〉。⁷⁸至於「詩」「文」一類，在舊本《通志》中被歸於卷末「雜著」下之零星條目；⁷⁹到了《新語》則獨立為卷11「文語」、卷12「詩語」。⁸⁰由上揭諸例可知：舊本《通志》「外志」下的零星條例，化用為《新語》一書中獨立的主要類別，其敘述比例也大幅提高，足見新舊二者之詳略有別。

總整而言，《新語》以「非政治」範疇為主要分類依準，將舊本《通志》中「略筆」交代的「外志」內容引入，並且提高了敘述比重與地位。所運用的書寫策略為，使之單獨成類並且賦予高度關注與評價。於是乎那些原本無法歸檔於政治權力或文明統御範疇的「異類」（仙釋）、「異文化」（蠻夷），甚或是「他者」（物怪）、災異等地方黑歷史，便堂而皇之地成為獨立類目，且升格為被敘述的主要對象，而成《新語》之「神語」、「墳語」、「怪語」，乃至於「人語」等等。如此別立一格的類目呈現方式，賦予神鬼、蠱厲、蠻夷與災異等暗黑敘述更深層的文化意義，迥異於三種舊本《廣東通志》之詳略配置，此其「奇」與「新」之所在。

⁷⁶ 此六條皆見第二本黃佐纂修，《嘉靖廣東通志》第4冊，卷69，「外志」五，「雜事（上）」，頁487-489、504、507。又，其內容大多沿用至第三本陳大科、戴耀修，《萬曆廣東通志》第6冊，卷71，「外志」六，「雜錄（上）」，頁789、804。

⁷⁷ 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稿》第1冊，卷37，「祥異」，頁596。

⁷⁸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頁4；卷4，頁122；卷9，頁275-276；卷28，頁675；卷3，頁58。

⁷⁹ 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稿》第1冊，卷39，「雜著」，頁619-624。

⁸⁰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1，頁287-311；卷12，頁312-328。

至若全書旨趣，亦藏於此。

蓋《新語》係承舊本《通志》「外志」而發皇，在敘述精神上順理成章地接榫為全書基調，並擴大敷衍，另成格局。所謂「外」者，乃泛指地方黑歷史之「異」與「惡」者，看似繁瑣雜蕪、稀奇荒誕的見聞，在《新語》中卻詳加載錄並抒發已論，凡此種種，實皆繫諸儒者聖人胸懷天下的宏大理想。蓋始於華夷之辨，分判「主／從」「內／外」之價值順次；繼而在夾敘夾議此邊境異文化異世界等「外」者時，提供有識之士能掌握夷情、採取因應，同時也勾勒了教化可及之文化版圖；此中不言而喻，流露出屈大均以南方粵地為最佳據點，來日當能施教遠邇他方而終能「化外為內」之殷殷期許。此「外志」敘述精神轉用為《新語》一書旨趣，而成「化外」深意之基調也。

(二)「旨趣」藏在細節之二：敘述特質與話語策略

承「外志」基調，《新語》如何擴大敷衍，另成格局，則有賴中國語言的多義性。蓋《新語》一書最常採用的，即有如博物誌或類書般的白描敘述。讀者泛泛閱覽，乍感其羅列駁雜之撩亂紛陳，極易歸結出粵地物產豐饒、人文壯麗之概括印象。然吾輩之研究，往往對文字所衍生的豐富歧義性，更感興趣；尤其是這類為後世閱眾自由詮釋為充滿隱晦暗喻的遺民著作，如龔自珍之譽為「奇文」，而雍乾之咎責為「悖逆」者。以故，筆者大膽假設：倘白描不僅僅止於白描，而著重於意在言外，如「杜鵑」之寄寓「思鄉」義，則除了依循古典抒情傳統外，屈大均還透過何種特殊的敘述方式與話語策略，來安置另一層在清政權高壓下，不可明說但卻至為重要、甚為深遠的撰述旨趣？而此又與前揭所謂攸關家國認同的遺民「隱語」者，如何同聲相應、互為表裡？

蓋史書之撰寫有所謂論贊，如《史》《漢》之評，乃「說話者」(speaker) 欲表彰歷史觀點而為。至於《新語》的敘述特質，相較於明亡前的三種舊本《廣東通志》之「紀實」取向，更傾向於撰者之「自我存在感」(self-existence) 與「身分認同」(identity) 的表述。例如，文中敘述民俗風物事件等，多有以第一人稱「我」之視角而表述，多處引入「予詩」為佐，或摻入「予以為」、「予謂不然」⁸¹ 的主觀立場，再結合篩選後的典籍片段，進行論述。這意味著「說話者」刻意強調，此為個人身歷其境、親身感受或個人汰選後所認同而「再現」(represent) 的文字，再經過類目編排、纂輯而成地方志，這即是將「個人記憶」與「文化知識」混同糅

⁸¹ 同前引，卷1，「天語」，〈日〉，頁2。

雜後，編織為「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⁸² 藉由刊刻流傳，播散於閱眾，影響後世，此又與安唐·布洛克 (Anton Blok) 所言「製作歷史」(making histories) 的流動過程，⁸³ 恰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強調主體存在感的敘述筆法，其成因複雜，主要是來自於易代世變下流離失所的生命狀態。尤其是屈大均這類至死仍堅守遺民身分的少數士子，在晚期仍致力於立言著書者，實具有強烈意圖，亟欲透過撰史以建構「活著」的意義，從而回應「未殉死」的生存焦慮。其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相近典例，即是張岱 (1597-1684)，於明亡後大量撰輯史傳。⁸⁴ 至於另一個可能的成因，則是個人的生命風調使然。與其說屈大均是位力求理性客觀的史家，倒不如說是感性與理性兼具、強調主觀表述的詩人，來得更為貼切。是以屈大均下筆為文時，即便在紀實徵信地羅列地方文物風俗之餘，仍屢屢引用自著的銘文或詩歌，糅雜其中；甚或在徵引諸家說法後，借題發揮地引入自身經驗，一躍而為該篇論述主導者，可謂屢見不鮮。而主觀情感或議論的表述，又有顯筆晦筆之別，如前揭「遺民隱語」實為「用晦」之極致者，筆者又可於屈大均《新語》一書中，先行掌握第一人稱「說話者」之「我」視角，再進一步剝筍似地層層逼近更隱晦、卻更核心的幽微曲衷。

具體而言，越是強調「客觀」的史傳，其「說話者」多半隱身於敘述 (narrative) 之中，需細細梳理，方見其跡；然而，屈大均撰寫地方知識時，卻是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跳出來「說故事」，並摻入「詩性」語言，抒發情感、表述認同。是以筆者梳理此文獻時，除了閱讀該書白描記載的人地事物之普羅知識外，⁸⁵ 更特別留意於以屈詩入文，或植入個人經驗之種種主觀詮釋，以及藉物詠懷而託寓

⁸² 此援引克利弗德·紀爾茲的概念。克利弗德·紀爾茲 (Clifford Geertz) 著，楊德睿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臺北：麥田出版，2002）。

⁸³ 此處援引安唐·布洛克觀點，他沿用馬克思之說而闡述其義，認為「製作歷史」中充滿建構、組成與塑造，研讀者須更自覺地指出是誰的建構，其間之權力安排、誰對過去的聲明得到承認和接受及其原因。安唐·布洛克，〈「製作歷史」的反思〉，收入克斯汀·海斯翠普 (Kirsten Hastrup) 編，賈士衡譯，《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與歷史製作》（臺北：麥田出版，1998），頁 201-211。

⁸⁴ 張岱於明亡後避兵入山隱居，之後完成了《石匱書》、《石匱書後集》、《史闕》等史學著作，其中《石匱書》雖於 1628 年即開始動筆，但到了 1654 年才完成。相關研究可參史景遷，《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臺北：時報出版，2009）。

⁸⁵ 《廣東新語》亦出現「傳鈔」他書而說成是己見的現象，而這是大部分古典筆記或志書中常見的敘述模式。學界目前尚未發展出一查證書中文獻最初源頭的有效方法，即便是大數據之檢索，亦有掛一漏萬之慮。故筆者將此類文獻視同為屈大均認同而擇入，或是屈大均藉此自抒感懷的文本。

家國認同的文獻，諸如：談〈諸鷄〉時，言「嶺南多珍鳥，予少時嘗喜畜養」；⁸⁶談〈猿〉時，表述「粵故多猿，予自二禺以至英德，……一路高峰絕巘，崖谷連綿，古木蔽天，……予輒落淚傷懷，不能自己」，⁸⁷以猿啼烘襯離鄉背井之傷懷；談〈乳羊〉時，引入：「予詩『仙茅春食乳羊肥』」；談〈香狸〉時，引入「予詩『食果三秋美，眠花一尺長』」；還有談〈竹繯〉時引「予詩『山子竹鷄豚』」⁸⁸等等，蓋以「予」之第一人稱表述者，俯摭即是。至於嶺南之「梅」，屈大均有多首題詠，學界早已關注，考其詠物「每寓故國之思、身世之感」；而詩中之「梅」，「多是明室的縮影和明遺民的化身」；⁸⁹由是以觀《新語》所載粵「梅」，亦頗多弦外之音。除引入自作詩「嶺梅一歲再開花」外，又由《易》解釋梅花係冬天至寒「從肅殺之中，洩其一陽之精，以為來春之生生者也」、「使萬物皆復其元，梅之德所以為大」，而粵地之梅乃得「天地一陽之復」之最先者，「故欲見天地之心者於梅，欲見梅得氣之先者於粵」，⁹⁰其狀寫粵地之梅獨得天地之心，歷經肅殺至寒而後展放來春生氣，竊揣其意，頗有以此惕勵遺民處境，並寄寓春天不遠之希望。是以《新語》中，「物」不僅僅是「物」，而往往充滿詩人身影與自我情感之投射，值得研究者尋繹再三。

茲以廣東特有的大胡蝶為例，詳加闡論。舊本《廣東通志初稿》記載「蝴蝶」，⁹¹僅簡言「橘虫所化」四字；而《新語》於卷 24「蟲語」中有〈大胡蝶〉，為篇幅最長者，達一千三百多字。特贅引該文前半，讀者適可由此觀其敘述層次之變化與語意蘊含之豐富：

大胡蝶，惟羅浮胡蝶洞有之。嘗止花樹間，見人弗動，即動亦依依不遠，采者連枝持出，輒飛復故處，不他之。其生以繭，繭中有一卵，小於鷄子，重胎沁紫，包以烏柏木葉，絡以綠絲，山中人嘗以冬月往采，

⁸⁶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20，「禽語」，頁 475。

⁸⁷ 同前引，卷 21，「獸語」，頁 490。

⁸⁸ 同前引，頁 493、495-496。

⁸⁹ 嚴志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頁 47。

⁹⁰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25，「木語」，頁 562-563。

⁹¹ 初見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稿》第 1 冊，卷 31，「土產」之「蛇蟲之屬」，頁 521；後增益內容百餘字：「蝴蝶，羅浮山有五色蝴蝶，大如蝙蝠。世傳為葛仙遺衣所化，《嶺表錄異》鶴子草蔓上，春生雙虫，只食葉。其越女取於粧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葉飼之，虫老不食而蛻為蝶，蝶亦黃色，婦人取而帶之，謂之媚蝶」。黃佐纂修，《嘉靖廣東通志》第 2 冊，卷 24，「民物志」五，「土產（下）」，「蟲品」，頁 620。

好事者購取藏之。明年二月，以繭置梧柳間，輒有一大胡蝶展翅徑尺，飛來就繭，不飲不食，抱伏纏綿。經七日，繭破子出，大可六七寸許，越數日，挾之飛去，其出繭絕不使人見，雖晝夜伺之，弗覺也。雌雄不離，千里外必相尋覓，至則繞籠翔舞，不得入。以翅觸籠，金翠委損，放之，兩兩相逐，翩然高舉。蓋羽族之至神者，精氣相通，無間遠邇，所謂仙靈之使令，非人間所得而羈也。予嘗有遠行，有一大胡蝶飛來，止庭柯三日。友人陳子謂：大胡蝶既美文章，舍仙山而集茲，與予氣類相感，非無意也。為詩云：「羅浮大蝴蝶，言是小鳳皇。六足盤胸間，四翅交文章。修眉若楊葉，繡腹如垂囊。仙人愛文采，挾之游帝傍。四海安足飛，來下君子堂。堂中有行子，比德共翱翔。」⁹²一時諸子屬和，繪圖以傳。予亦有詩云：「翩翩大蝶誰所為，莊得其雄老得雌。芙蓉沆瀣日餐服，流將一氣母羣兒。」又云：「變化不離玄牝內，世上蜉蝣那足配。南郭今為槁木藏，葛洪不見丹砂在。」其亦得物化之旨歟？大胡蝶以花為糧，予嘗於華首臺見有花如紅芍藥，大胡蝶食之，倏盡數朵，道人掩取其一，誤傷之。以翅為團扇，五色絢爛，金粉流光，真神仙之服玩也。廣州人士向有大胡蝶會，冬月，使人入羅浮，以鍼及綿絲帶，易繭于牧豎，春間大胡蝶出繭，文采各別，雖百十無一同者，以絲竹籠貯之，攜往浮丘、穗石間，以胡蝶大小較勝負，買花犒之。其花或使人采於羅浮百花逕中，逕多異花，四時爛若錦繡，大胡蝶之土物也。羅浮諸洞，皆有異花，瞥見之，欲折不折，行數武還視，輒失之，惟逕中花可嘗取。予詩：「祇愁胡蝶大如箕，食盡山花人不知。紅翠紛紛難與守，芳菲又過豔陽時。」⁹³

起首採白描敘寫，盛言粵地特產之大胡蝶，繼而概述此物類由蟲卵、化繭、孵化成蝶之成長歷程，大約 267 字。以下近 500 字則以「予嘗」二字帶入個人經驗，並引

⁹² 經筆者查核，此詩「小鳳凰」又作「小鳳皇」；又，「挾之游帝傍」後，當有「雲霞為友朋，沆瀣為酒漿。倦息珠闕上，饑采若木英」四句。陳恭尹，《獨漉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五年（1825）陳量平刻本），卷 2，〈羅浮蝴蝶歌送屈翁山〉，頁 33；又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 8 冊，頁 2051。

⁹³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24，「蟲語」，〈大胡蝶〉，頁 539-540。據木天閣本校勘，今本皆以「徑」代「逕」，「採」代「采」，今本「亦依依不遠」前缺「即動」二字，皆從古本而改之。

入多首自作詩，辭情洋溢而極力稱美胡蜨。觀其尊大胡蜨為「羽族之至神者」、「仙靈之使令」，狀寫形色為「五色絢爛，金粉流光，真神仙之服玩」；又述嘗偕友遠行山中見胡蜨事，並節引諸唱和詩，皆非尋常之白描記載與紀遊敘事而已。試推敲其意，乃在藉物抒感，有所寄託。然而，究竟所託為何？

經筆者考：該趟羅浮胡蜨洞之旅，同行者數人，所謂「友人陳子」即為陳恭尹(1631-1700)，此外，還有梁佩蘭(1629-1705)、陳子升(1614-1673)等，多為遺民或與遺民過從甚密者。極有意思的是，如仙靈使令的大胡蜨，似有感應地飛來院中，憩於庭樹三日。陳恭尹認為這是因為大胡蜨與屈大均「氣類相感，非無意」，數人亦感其殊異而作詩唱和，繪圖以傳。文中引入數詩，大抵皆由「蜨即屈氏，屈氏即蜨」發揮，如屈大均自作詩，狀寫胡蜨餐服沆瀣異花（不食人間煙火），又援引「莊周夢蝶」典故，由「物化」論人生大道（悟道之身）；而陳恭尹詩則以屈氏為比德君子，如大胡蜨之翩翩起舞，非為人間得以羈絆。除此之外，經筆者蒐羅又得其同行者陳子升唱和詩，並未收入屈氏此文當中。然該詩亦由胡蜨與屈氏氣類相感而發揮：「胡蜨來從胡蜨洞，南園先集羅浮鳳。鳳衰久作接輿歌，昨夜蜨酣莊叟夢。東家西家胡蜨飛，蜨黃蜨白爭春暉。羅浮大蜨真鳳子，暫憩華堂還翠微。屈生卻自翠微出，欲走名都懷道術。卜居未忍便沈湘，修辭莫是身曾漆。藻思如餐婀娜花，翱翔遠食琅玕實。神仙之侶不可羈，還待憐才重惜之。文章被服人尚愛，況乃吐納生神奇。送君鳳皇臺畔去，去去逍遙君自知。」⁹⁴起首以楚狂接輿慨嘆世衰道微，再由羅浮胡蜨為真鳳子，沉喻亂世中的屈大均。下以「神仙之侶不可羈，還待憐才重惜之」，稱屈生不為世網所羈，更期待將來，有憐才者重用惜愛之，結尾以逍遙來去，述其生命風調之高揚。由上揭文獻足徵：詠物抒懷的託喻筆法，於遺民士子之間的唱和中，實屬尋常；而二陳詩作皆適足佐證筆者之推論：蓋屈大均《新語》之言「胡蜨」，實有家國認同之深沉託寓，因當時諸遺民寫詩氛圍即如此也。蓋入清後文網日密，對於堅守遺民身分的屈大均而言，粵地特產「大胡蜨」之所謂「輒飛復故處不他之」、「以翅觸籠，金翠委損」、「非人間所得而羈」等特質，適足以寄寓己身「心懷故處無二心」、「為掙脫牢籠，寧可折損」、「實不為人間羈絆」之心志，並期能得逍遙（暗喻不受清政府箝制）之深切期待。此為勝國遺民假「隱語」於詠物之際，抒發家國感懷之典例也。

⁹⁴ 陳子升，《中洲草堂遺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詩雪軒校刊本），卷7，〈羅浮胡蝶歌送屈翁山之金陵同梁芝五陳元孝席上賦〉，頁46；又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8冊，頁2028。

在此之外，《新語》敘述筆法中，亦間有著眼於那些已然不存在之事物者，如〈二湖〉：

會城中故有二湖，其一曰西湖，亦曰仙湖，在古甕城西，偽南漢劉龔⁹⁵之所鑿也。其水北接文溪，東連沙澳，與藥洲為一，長百餘丈，歲久淤塞，宋經略陳峴疏濬之，輦龔故苑，奇石置其旁，多植白蓮，因易名白蓮池，而湖亡。其東偏，今有仙湖里遺焉。其一曰蘭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廣州志》：「蘭湖在雙井街，其水常瀦。」今亦亡。其地亦猶曰蘭湖里云。城中又有二洲，一曰粵洲，在玄覽臺西，為白雲之水所注；一曰藥洲，在越王臺西南一里，即龔所鑿仙湖，與之為一者也。二水既廣，復與番、禺二山青蒼映帶，每當春秋佳日，登臨者不出三城之外，其觀已足。今也三城連而為一，三山亦失其二，⁹⁶番與禺僅存培塿，而洲與湖之烟波浩淼，皆不可問矣。王于一有言：「世之變也，志風雅者，當紀亡而不紀存。」嗚呼！吾粵之所以亡者，今豈惟二湖二洲之勝概而已哉。⁹⁷

經筆者考查，文中所言「芝蘭湖」地理係延用舊本《通志》，⁹⁸然《新語》特立「二湖」細目，結合「仙湖」、「粵洲」及「藥洲」等零星文獻，由二湖二洲之興衰發論，慨嘆當年之煙波浩淼，已然不在。文中引清初散文家王猷定（1598-1662）語，言世變之後，狀寫地方風雅「當紀亡而不紀存」，其意在假他人之言以澆胸中塊壘甚明矣。蓋屈大均於世變後撰寫《新語》，間有紀亡之處，實多寄寓家國之思，此一典例也。

由此看來，上引諸例之語言風調，在本質上，似更類近於中國詩歌詠物諷諭傳統以及史傳論贊之批判筆法，相較與「忠於史實」的客觀要求、排除自我情感、以博物誌等物質羅列的白描記錄手法，則明顯為「感性／理性」「虛／實」兩個極端的不同趨向。整體而言，屈大均在《新語》中運用充滿說話者身影、強調主體存在

⁹⁵ 木天閣本作「龔」，宜從「龔」。

⁹⁶ 三山為番山、禺山與粵秀山。屈大均，《廣東新語》，卷3，「山語」，〈三山〉，頁69-70。

⁹⁷ 同前引，卷4，「水語」，頁122。

⁹⁸ 黃佐本有〈芝蘭湖〉曰：「《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旁多人家，其流南注西海」，又下引《語林》及古詩言及此者。黃佐纂修，《嘉靖廣東通志》第4冊，卷69，「外志」五，「雜事（上）」，〈芝蘭湖〉，頁488-489；《萬曆廣東通志》亦多延用。

感的敘述筆法，間或紀亡而不紀存等懷想過往之側重寫虛，或援引詠物託寓之詩學傳統，從而寄寓深層的奧言旨趣，展現遺民「隱語」式的豐富歧義。無論是敘事、議論或是詠物的多元展現，皆形成《新語》與舊本《廣東通志》有別的敘述特質。而這樣的敘述特質與話語策略，自然成為筆者梳理與建構該書之文化隱喻，尤以攸關「家國認同」之「化外」論述時，最可以著力的切入點。

反觀過去學界有關《新語》的研究視角，多半關注於具體物質文化與社會經濟，實則尚未能窮盡該書之旨趣。正如屈大均自序所表述：

或曰：「子所言止於父母之邦，不過一鄉一國，其語為小。」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無窮見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廣厚見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廣大與不測見矣。夫無窮不在無窮，而在昭昭；廣厚不在廣厚，而在一撮土；廣大不在廣大，而在一卷石；不測不在不測，而在一勺。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無小大，大而天下，小而一鄉一國。有不語，語則無小不大。⁹⁹

字面上言天言地言山言水言石，讀者由此得知粵地之山川奇麗、物產博雜；但作者一再強調，書中所述重點，當在於物象背後所彰顯的「昭昭之道」，是以讀者不應僅僅止於事物表象之理解。後之閱眾如你我者，亦當執此金鑰以察其旨趣，追索屈大均所欲託寓的「昭昭之道」，究竟是何指涉。潘耒於書首作序，亦揭示屈大均著書旨趣的多重性：

又以山川秀異，物產之瑰奇，風俗之推遷，氣候之參錯，與中州絕異，未至其地者不聞，至其地者不盡見，不可無書以敘述之。於是考方輿，披志乘，驗之以身經，徵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語》一書。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談義也博而辨，其陳辭也婉而多風，思古傷今，維風正俗之意，時時見于言表。遊覽者可以觀土風，仕宦者可以知民隱，作史者可以徵故實，摘詞者可以資華潤，視《華陽國志》、《嶺南異物志》、

⁹⁹ 屈大均，《廣東新語》，〈廣東新語自序〉，頁3-4。此處據學生書局版本校勘，「其廣厚見矣」前當有「而」字。

《桂海虞衡》、《入蜀記》諸書，¹⁰⁰ 不啻兼有其美。¹⁰¹

所謂察物精核，談義博辯，大抵指陳具體的社會民生經濟及物質文化，此乃顯而易見者；唯屈大均所期許的「知言君子」，¹⁰² 當讀出《新語》之旨，在於具體文物之補闕以外，還有「陳詞婉而多風，思古傷今，維風正俗」，這才是作者精神託寓及旨趣所在。是以，推敲「下以風刺上」之民隱，¹⁰³ 體會「思古傷今」之用意，領略其「維風正俗」的深意，即是本節亟欲探討「遺民隱語」式的話語策略與文學隱喻。

綜上所述，不論是體例類目之命名與安排，或是敘述特質與話語策略的運用，在在凸顯《新語》有關廣東一地的普羅物類以及奇風異俗的載記，並不止於具體的補闕罅漏，亦非為了滿足文人「獵奇好異」心態，而是假此隱喻、託寓或輾轉論述等多元敘述方式，層層包覆所欲蘊含的昭昭天理、攸關家國認同以及未來王道遠颺的「化外」旨趣。

三、《廣東新語》「化外」深意的互文展現

屈大均所認知的「化外」，究竟展現了何種豐富歧義性？除了前揭「外志」敘述精神為基調，再加上強調主體存在感、間或紀亡而不紀存，以及遺民「隱語」等筆法之外，筆者猶感好奇：「化外」論述如何在屈大均其他諸作中，以「互文」方式呈現其多重意涵？

所謂「化外」論述的開展，必然始於觀點上「內／外」、「中央／邊緣」、「文明／野蠻」的區辨。經筆者歸納考察，確認屈大均自始至終都具有十分明確的「內／外」區辨意識，而這個意識亦貫串於其他作品當中，交織形成一套意義網絡，是故筆者得以互文並置的方式統整論述之。

首揭「內／外」的區辨意識。讀者可由屈大均晚年自號「三外野人」，見其端

¹⁰⁰ 此所列諸書分別為東晉常璩《華陽國志》、東漢楊孚《嶺南異物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南宋陸遊《入蜀記》等，多載地方風土物產等，類近地方志。

¹⁰¹ 潘耒，〈廣東新語序〉，收入屈大均，《廣東新語》，頁1。

¹⁰² 屈大均，《廣東新語》，〈廣東新語自序〉，頁3。

¹⁰³ 此由「風」字上溯《詩經》序所言「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譏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之義。

倪。此號係取法宋遺民鄭思肖 (1241-1318)，¹⁰⁴ 所謂「野人」，乃逍遙政權之外、不受拘束之逸民（異民）；至於「三外」，除了與《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翁山詩外》三書有關，¹⁰⁵ 更指陳遺民士子居處於天、地、人三者之外的流離狀態：

予嘗見元張叔夏《山中白雲詞》卷有〈三外野人序〉，蓋鄭所南氏也。予不幸生與所南之時不異，而嘗有《翁山易外》、《詩外》、《文外》三書行世，自稱「屈氏三外」。不謂所南先得我心，豈所南所著《心史》之外，亦嘗有「三外」之書耶？吾知之矣，所南之身，以為在天、地、人之外，其時之天、地、人，不可以身在其內也。嗟夫，世有人焉，生於天、地、人之內，而乃以為在天、地、人之外，又非遊方之外者，可同日語，則其人豈非天下之至窮，而無所歸者哉？予所著三《外》之書，非此之謂，而其人則與所南同矣。於是，亦自稱三外野人，而為之贊曰：「噫嘻，我生之初，在三之內；我生之後，在三之外。身已非人，苦未蟬蛻。鳥獸羣中，徒自怨艾。乾坤之毀，適逢其會。人身有半，頂踵災害。所幸盜跖，吾肝未膾。油油與偕，不恭是賴。」¹⁰⁶

為何聲稱「身已非人」？是因為士子所處世局正遭逢乾坤已毀、天下至窮的困境，遂致「不可以身在其內」而無所依歸，故知所謂「三外」之名，實託寓了鼎革後失所無依的生命狀態。再看屈氏以「外」為名的書序，如何自揭旨趣：

予所著有《翁山易外》、《廣東新語》、《有明四朝成仁錄》、《翁山文外》、《詩外》凡五種，號曰《屈沱五書》。五書中，自視唯《文外》最下，未能盡善，輒欲棄而不錄。二三友人以為，此非予之文，乃予之心所存。天地之心在日月，以薄蝕而愈見其文；聖人之心在六經，以殘闕而愈見其文；子之心在文外，以為未盡善，而愈見其文。後之君子，求子之文於盡善之中，非子之知己；求子之文于未盡善之中，斯子

¹⁰⁴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又號三外野人。南亡後隱居為遺民。

¹⁰⁵ 汪宗衍、李文約輯著校點，〈屈氏族譜〉，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8冊，「附錄三」，頁2115。

¹⁰⁶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1，〈三外野人贊〉，頁209-210。

之知己已。庸可棄諸？¹⁰⁷

有外之言，是吾用晦。在昔殷仁，文明在內。日當昃時，以月自代。匪日之謙，光生於昧。¹⁰⁸

蓋稱之為「外」，係為了「用晦」。因為今非昔比，過去是日明的昭昭時代，而今卻是日昃的晦暗時期，起而代之的是「月」，而月則必有圓缺明晦之變化，吾輩所見即此明晦變化之現象也。也因此更當瞭然於胸的是，未來文明教化之大放光明，必由此一時期之晦暗蒙昧中生出；換言之，今日的「暗黑」，即是未來文明生成之初所。屈氏自言《文外》最下，殘缺而未盡善，如月之薄蝕非圓滿，卻也正是屈氏之「心」之所在。足見「外」之稱，並非停滯於邊緣化、他者化、妖魔化的貶義語，而是別有用心、有所託寓，是為了邁向未來迎接光明之終將到來而暫處的暗黑狀態，實蘊含了積極正面之期許語。

在屈氏語脈中，上揭「外」義，又與《新語》有何互文式的補充義呢？如屈氏自言：

《國語》為《春秋》外傳，《世說》為《晉書》外史，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為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書成，自《天語》至于《怪語》，凡為二十八卷，中間未盡雅馴，則嗜奇尚異之失，予之過也。¹⁰⁹

蓋《新語》即「外志」，而此「外」之意義，除了裨補前誌之缺，亦具有以此彰顯昭昭之道，可推而廣之，遍及天下，甚而無窮盡。文末雖自懺述作之過為「嗜奇尚異」、「未盡雅馴」，然筆者據前後文推敲，顯非貶義，而是周折隱微、頗具深意的反語。

蓋前引「文外」語，強調「文外」為最下，充滿了「未盡善」、「殘闕」與「薄蝕」之晦暗，但卻也是屈氏「心」之所在；執此以觀，《新語》中屈氏自言其「過」在於「奇」、「異」、「未盡雅馴」，而這類敘述卻是舊史之「闕」所在，

¹⁰⁷ 同前引，〈翁山文外自序〉，頁1。

¹⁰⁸ 同前引，〈文外銘〉，頁1。

¹⁰⁹ 屈大均，〈廣東新語〉，〈廣東新語自序〉，頁3。

亦正是地方史之「暗黑」所在；如此說來，《新語》中那類談神弄鬼、未盡雅馴的「異／惡」文化，是否也正是屈氏之「心語」所在？而這正是未來「光明」生成初始之昏昧狀態？

然而，在光明來臨之前，君子又該如「用晦而明」？茲再以《新語》中論前史〈外志〉補充說明：

葉石洞作《肇慶志》，其〈外志〉論云：「無不覆幬，天道也；如天之無不覆幬，王道也。王者無外，志有外何？因其外而外之。孰外？仙也、釋也、獠也、獞也，皆外也。仙、釋、獠、獞之為外何？仙、釋蔑棄人倫，而詭言出世；獠、獞傲狠王法，而自異齊民，皆外於聖人之教、明王之治者也，故外之。然則遂外之乎？固將內之也。外而曰內之何？《易》稱顯比，《書》曰並生，《春秋》大一統，歸斯受之而已。是故志而外之，所以明有義也；外而志之，所以明有仁也，仁義立而王道備矣。」¹¹⁰

葉春及（1532-1595）撰有《萬曆肇慶府志》，¹¹¹而屈氏此引葉氏〈外志〉之意闡述：蓋仙釋出世而瑤、僮異族，皆屬聖人教化之外者，撰史者特別載入府志，意在「內」之以仁義王道教化也。筆者綜合上述諸則論「外」文獻，足知：屈大均《新語》，既言《新語》係「外志」之稱，故所有「嗜奇尚異」的暗黑史料，雖非雅正馴化之語，甚至充滿晦暗、闕失、殘缺、不圓滿者，卻正是屈氏用「心」之所在，所謂「光生於昧」，「外」者終將納為「內」，「昏昧」終將轉成「光明」，此與屈氏之論《陰符》「日月以用晦而明，人心以用闇而章」，¹¹²以及論《易》〈明

¹¹⁰ 同前引，卷11，「文語」，〈外志〉，頁302。

¹¹¹ 葉春及，字化甫，號石洞，明代廣東惠州歸善縣人，著作有《石洞集》。鄭一麟修，葉春及纂，《萬曆肇慶府志》，《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197-199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明萬曆十六年（1588）刻本）。這本志書是肇慶現存最早府志，始修於萬曆十五年，次年秋成書。卷首載列「輿圖」，下分「郡事紀」、「沿革表」、「秩官表」、「選舉表」、「地理志」、「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祀典志」、「兵防志」、「名宦傳」、「流寓傳」、「人物傳」、「列女傳」、「外志」、「雜志」十六門。體例是傳統方志中具有圖經、紀、表、志、傳，最後有外志。「外志」為仙、釋、徭、獞等，仙釋相對於儒家，徭獞則是蠻夷外族也。

¹¹² 屈大均亦盛讚《陰符經》，尤其論及「不神」與本處所論互為發皇：「吾嘗愛其善言神矣。夫《說卦》稱帝稱神，可謂極其玄微，而《陰符》言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神所以神。郭子以為神之神，見者顯者；不神之神，隱者微者。神之神，用也；不神之神，體也。日月之明為神

夷〉之「君子於明不失其晦，於晦不失其明；明晦相為內外，天地相為始終」¹¹³ 等強調「用晦而明」的應世之道，互為發皇。

總括而論，研究者統攝屈大均諸作之「外」字，倘捨特定語脈之嚴格義，而採遺民隱語式，以互文網絡之超連結理解之，則其派生之多重涵義，誠為可觀。蓋屈氏所謂「外」，不但指陳了遺民之艱困處境，乃是天崩地解後無所依歸的晦暗時代；但也表述自我期許，君子於此漫漫長夜，當守「用晦」之道，依仁義、施教化，使中華文化得被及蠻陌，化「外」為「內」，以待昭昭日明之治世到來。

值得更進一步澄清的，即屈大均《新語》「化外」深意，實涵括了此種「用晦而明」、「化外為內」的歷時變化；換言之，即以粵地邊境，發用此一積極動能，從而偏霸南方以待中原之復，此一「化外」大業之文化藍圖，即成全書之骨架血肉。¹¹⁴ 茲以此總結本文於下。

四、結語：《廣東新語》之文化定位與「化外為內」之歷時進程

總匯前述析論，試勾勒此書之文化定位如下：蓋《新語》一書，係誓死捍衛「遺民」身分之屈大均，歷經多年抗清未果，後返鄉著書立言之晚期作品。屈氏期以地方史志之書寫，回應「天崩地坼」綱常瓦解的失序狀態，嘗試於此中建構家國認同與文化身分，從而化解「未殉死」之存在焦慮。一方面轉用舊本《通志》「外志」為內容，描述地方黑歷史之「惡」與「異」而為「外」者，諸如長篇載記之奇風異俗與駭人耳聞的人事地物，即地方上晦暗、殘缺、未盡善之所在，以作為「有待開化」之文化施教對象；另一方面，則透過「遺民隱語」式的話語策略與意義聯

之神；其晦也，不神之神。日月以用晦而明，人心以用闇而章。故曰『陰符』。斯說也，不惟得《陰符》之奧，實得《易》之奧焉。」屈大均，《翁山文鈔》，卷 1，〈《陰符經註》序〉，頁 276-277。

¹¹³ 屈大均在《翁山易外》〈明夷〉卦中論及「明晦之道」：「日旦，鳥之于飛；日昃，鳥之垂翼也，君子象之。當夜而蒲伏以行，用晦之道也。晉者君子之晝，明夷者君子之夜也。日貴用其晦，月貴用其明也」、「君子獲晉之心於晝，獲明夷之心於夜。晝之明，心之出也；夜之晦，心之入也。心從地而出于天，故晦為明之本；心從天而入于地，故明為晦之本。用明而晦者，天之事也；用晦而明者，地之事也。君子於明而不失其晦，於晦而不失其明；明晦相為內外，天地相為始終。」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 5 冊，《翁山易外》，卷 36，〈明夷〉，頁 308-310。

¹¹⁴ 至於「外」之具體指涉，如前引葉春及《外志》所指，即本題研究延伸所鎖定的地方史之暗黑議題：鬼神（仙釋）、巫蠱瘴癘癡癲（邪崇）、災異（趨吉避凶）、蠻夷異文化等「嗜奇尚異，未盡雅馴」者也。

結，強調自我存在與家國認同，勾勒粵地源於華夏之諸文化為「內」，以作為「人文化成」之發展基礎。全書之架構，起首即以「天」、「地」二語類，回返鴻濛初始即有之根本，撐起有情人間之綱常秩序；繼而以博雜物類，鋪陳粵地為天下精華所聚，故而物產豐饒、人文壯麗；再由歷史發展系譜之建構，凸顯粵地自古即為天子偏霸之所，實不負「海濱鄒魯」之美稱，¹¹⁵從而勾勒未來「光明」與「人文化成」之可能。此種文化天下之理想藍圖，始於「內／外」區辨之文化自覺，經由「用晦而明」、「化外為內」的施教歷程，而後終至王道盛行之大業，此即《新語》「化外」旨趣之發用與開展也。

誠如史學家許倬雲總括儒家文化所論之「內／外」，係一種歷時變化的「我者」與「他者」，同時又具有「中心」與「邊陲」的複雜互動；而所謂「天下」，則是一種無遠弗屆的同心圓，一層一層地，由開化推向未開化。故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人」。¹¹⁶此乃極具宏觀視野之論述，適彰顯本題個案深究之旨，亦昭示閱讀《新語》之可行策略。

具體來說，作為地方史志，《新語》實不乏馳騁「好奇尚異」、「非雅馴」之筆墨，此即前所謂「外」者。例如，「人語」〈黎人〉，言其有生、熟之別，又善於咒鬼作祟：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牴牾，即咒其已亡父母，逾時其人身如火熾，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過，第曰獲罪土神，請為飯謝。覓酒脯與之，祭于地，喃喃其詞，祭畢，夫婦分而啖之，病人欬然起矣。其或土商與貿易，欺以贗物，則出伏路旁，執塗人¹¹⁷以歸，極其箠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訟其人償以原物，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訟其同侶，聞官遣熟黎持牒曉之，雖不識字，覩印文而亦釋遣焉。¹¹⁸

讀者初始不免為其所述而瞠目咋舌，在好奇尚異之餘，宜當更進一步在屈氏語脈中尋求互文解釋，即得「地語」〈開拓黎地〉條。後文針對黎人之野蠻情狀具體建言，認為「不過數年，可使盡入版籍，化為編民，斯亦王者無外之舉也」。¹¹⁹如此並置齊讀，方得旨趣。由是可知，掌握《新語》旨趣之最佳閱讀策略為：在披覽

¹¹⁵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地〉，頁26。

¹¹⁶ 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2、20。

¹¹⁷ 《屈大均全集》本作「途」，今據木天閣校為「塗」。

¹¹⁸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7，「人語」，〈黎人〉，頁220-221。

¹¹⁹ 同前引，卷2，「地語」，〈開拓黎地〉，頁50。

「異」文化以感受其駭異怪奇的同時，當更進一步覺察「說話者」之意圖，及其如何運用分判華夷、區辨內外的話語策略，表述「化及蠻陌」之殷殷期盼。執此以觀他例，即可理解《新語》記載居儋州、性如魚鱉之「黑人」，而有「今變華風」之語；¹²⁰ 敘及今已零落之「馬人」，而有「終古識華夷」之歎。¹²¹ 在此之外，尚有兇悍好鬥且多妖術之「瑤人」、「僮人」，¹²² 以及盜賊猖獗、¹²³ 瘴癘肆虐¹²⁴ 等地方暗黑敘述，而莫不終歸於期許能「化外為內」、「用晦而明」，以待王道盛行之日明昭昭到來也。

值得一提的是，《新語》中雖標舉「光明」為仰望之所，然因為屈氏所處之當時，仍為黎明前的漫漫長夜，故其所述之「暗黑」，多為教化未及之蒙昧晦暗，便以長篇重筆，詳加敘寫；換言之，全書對於「黑暗」之敘述比重，時而多於「光明」。如〈僮人〉、〈瑤人〉二篇皆近 2500 字，〈黎人〉約 2200 字，所述皆是南國邊境之異文化，而在「人語」一類中，相較於〈高固〉、〈何真〉、〈海忠介〉等漢華文化之數百字敘述，明顯詳略有別。筆者特別留意書中這類長篇敘述，審其用意：乃是為了迎接「光明之日」到來前，所預先進行的文化區辨以及知識蒐羅，如前揭「外志」之書寫精神也。

行文至此，茲以屈大均為龐韶臺先生集所作序，來勾勒《新語》一書載錄「外」文化的敘述基模，係為「暗黑」與「光明」之辯證存在，呈現出與時俱進的動態歷程：

以教童蒙，……乘巨象，冒瘴煙，……先求蠻夷之蒙而告之，其應者皆盤瓠之族白黑二仲與儼儼之民也。人各異音，書各殊字，男女穢雜，人獸無常。公嘗欲為同文，編以三家經及聖諭、《大明律》，關係人倫之大者，大書漢字於前，附註夷字於下，以教雲南、迤東、迤西諸夷。又奏請賜姓千餘字，以別其種類，而無同姓為婚之瀆。先生以為箕子開朝鮮，泰伯治吳，夫子欲居九夷，我有以發其蒙而教之，說其耳目之桎梏，而禦其心之寇，使咸知仁義，而服《詩》、《書》，以無外聖人之

¹²⁰ 同前引，卷 7，「人語」，〈黑人〉，頁 213。

¹²¹ 同前引，〈馬人〉，頁 212。

¹²² 同前引，〈瑤人〉、〈僮人〉，頁 214-217。

¹²³ 「人語」下，有〈盜〉、〈蛋家賊〉、〈黃盜〉、〈永安諸盜〉等條目。同前引，頁 223-229。

¹²⁴ 同前引，卷 1，「天語」，〈瘴〉，頁 21-22。

化，斯則吾之所以為繼述之大焉且矣。¹²⁵

觀其敘述蠻夷之邦，如「乘巨象、冒瘴煙」、「男女穢雜，人獸無常」等用語，實充滿了區辨「外」文化為「他者」、「異類」的權力話語；然細讀全文至末，則發現旨趣所在：蓋屈大均盛言讚許龐韶臺能於此荒蕪之境，堅持以《大明律》等中華文化，教化蠻童，使之「咸知仁義」、「以無外聖人之化」。此種始於描繪「外」文化（區辨內外）以作為教外對象，歷經「用晦而明」、「化外為內」的地方深耕，而終於完成教化普行大業的敘述模式，適可作為研究者詮解《新語》的路徑。倘以《新語》為「心語」之隱語，則屈氏之心，大概不離此義矣。唯《新語》所企圖勾勒王道盛行之文化大業，如何在昔日視為邊境的南粵，先行開展為偏霸一方的局面，而墳中鬼魅又如何可以作為當世楷模，瘴癘疫疾又如何與華夷文化有關，諸多獨特而精采的互文論述，仍有待筆者另撰專論繼力深究。本文嘗試建構《新語》之多重旨趣，認為此書不僅僅為地方文物風俗之記錄而已，還蘊藏了攸關「家國認同」的遺民隱語，以及深遠的「化外」論述與文化意蘊。期能由此重啟閱讀金鑰，吾等於披覽咀嚼、尋味再三之際，得以領略世變下士子撰史之多元風貌。

（責任校對：劉思好）

¹²⁵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2，〈龐韶臺先生集序〉，頁51-52。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 弼 Wang Bi、韓康伯 Han Kangbo 注，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疏，《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5，《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ben*。
- 王與之 Wang Yuzhi，《周禮訂義》*Zhouli dingyi*，《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經部第 9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Yingyin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ben*。
- 孔安國 Kong Anguo 傳，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尚書正義》*Shangshu zhengy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5，《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ben*。
- 李 昉 Li Fang 等奉敕撰，《太平御覽》*Taiping yulan*，臺北 Taipei：大化書局 Dahua shuju，1980，影印宋刊本 *Yingyin Song kanben*。
- 李 賢 Li Xian 等修纂，《大明一統志》*Da Ming yitong zhi*，《中華再造善本》*Zhonghua zaizao shanben* 明代編史部第 7 輯，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2009，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1461）內府刻本 *Zhongshan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 Tianshun wu nian (1461) neifu keben*。
- 杜 預 Du Yu 注，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春秋左傳正義》*Chunqiu Zuozhuan zhengy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5，《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ben*。
- 吳道鎔 Wu Daorong，《澹齋文存》*Danan wencun*，新北 New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75。
- 金光祖 Jin Guangzu 修，莫慶元 Mo Qingyuan 等纂，《康熙廣東通志》*Kangxi Guangdong tongzhi*，《廣州大典》*Guangzhou dadian* 第 35 輯史部方志類第 7-9 冊，廣州 Guangzhou：廣州出版社 Guangzhou chubanshe，2015，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1675）修三十六年（1697）刻本 *Guangdong shengli Zhongshan tushuguan cang Qing Kangxi shisi nian (1675) xiu sanshiliu nian (1697) keben*。
- 屈大均 Qu Dajun，《廣東新語》*Guangdong xinyu*，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68。

- _____, 《廣東新語》 *Guangdong xinyu*, 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藏版本 Riben Zaodaotian daxue suocang banben,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5/ru05_03051/ru05_03051_0001/ru05_03051_0001.pdf, 2018 年 9 月 30 日下載。
- 屈大均 Qu Dajun 著, 歐初 Ou Chu、王貴忱 Wang Guichen 主編, 《屈大均全集》 *Qu Dajun quanji*,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96。
- 范曄 Fan Ye 撰, 李賢 Li Xian 等注, 《後漢書》 *Hou Han shu*, 臺北 Taipei: 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 1975。
- 陳大科 Chen Dake、戴耀 Dai Yao 修, 郭棐 Guo Fei 等纂, 《萬曆廣東通志》 *Wanli Guangdong tongzhi*, 《廣州大典》 *Guangzhou dadian* 第 35 輯史部方志類第 5-6 冊, 廣州 Guangzhou: 廣州出版社 Guangzhou chubanshe, 2015, 影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 (1602) 刻本 Yingyin Riben guoli gongwenshuguan cang Ming Wanli sanshi nian (1602) keben。
- 陳子升 Chen Zisheng, 《中洲草堂遺集》 *Zhongzhou caotang yiji*, 《清代詩文集彙編》 *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 48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0, 清康熙五十九年 (1720) 詩雪軒校刊本 Qing Kangxi wushijiu nian (1720) Shixuexuan jiaokanben。
- 陳伯陶 Chen Botao, 《勝朝粵東遺民錄》 *Shengchao Yuedong yimin lu*, 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Guojia tushuguan Taiwan huawen dianzishu,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Guoli Taiwan daxue tushuguan 藏, 板藏真逸寄廬民國六年 (1917) 刊本 Bancang Zhenyi jilu minguo liu nian (1917) kanben。
- 陳恭尹 Chen Gongyin, 《獨漈堂詩集》 *Dulutang shiji*,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413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五年 (1825) 陳量平刻本 Zhongguo kexueyuan tushuguan cang Qing Daoguang wu nian (1825) Chen Liangping keben。
- 張學華 Zhang Xuehua, 《閩齋稿》 *Anzhai gao*, 廣州 Guangzhou: 蔚興印刷場 Weixing yinshuachang, 1948; 後收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Guoli Taiwan daxue tushuguan cang, 《民國輯逸》 *Minguo jiyi* 第 100 冊, 新北 New Taipei: 大統圖書 Datong tushu, 2009。
- 黃佐 Huang Zuo 纂修, 《嘉靖廣東通志》 *Jiajing Guangdong tongzhi*, 《廣州大典》 *Guangzhou dadian* 第 35 輯史部方志類第 2-4 冊, 廣州 Guangzhou: 廣州出版社 Guangzhou chubanshe, 2015,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 (1561) 刻本 Guandong shengli Zhongshan tushuguan cang Ming Jiajing sishi nian (1561) keben。

- 鄭一麟 Zheng Yilin 修，葉春及 Ye Chunji 纂，《萬曆肇慶府志》*Wanli Zhaoqingfu zhi*，《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Shanghai tushuguan cang xijian fangzhi congtan* 第 197-199 冊，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2011，明萬曆十六年 (1588) 刻本 Ming Wanli shiliu nian (1588) keban。
- 劉知幾 Liu Zhiji 著，浦起龍 Pu Qilong 通釋，王煦華 Wang Xuhua 整理，《史通通釋》*Shitong tong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9。
- 戴璟 Dai Jing 修，張岳 Zhang Yue 等纂，《嘉靖廣東通志初稿》*Jiajing Guangdong tongzhi chugao*，《廣州大典》*Guangzhou dadian* 第 35 輯史部方志類第 1 冊，廣州 Guangzhou：廣州出版社 Guangzhou chubanshe，2015，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 (1535) 刻本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 Jiajing shisi nian (1535) keban。
- 龔自珍 Gong Zizhen 著，王佩誨 Wang Peizheng 校，《龔自珍全集》*Gong Zizhen quan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二、近人論著

- 王瑾 Wang Jin，《互文性》*Huwenxing*，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5。
- 王蕾 Wang Lei、沈津 Shen Jin 主編，《《廣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獻書志》*Guangzhou dadian haiwai zhenxi wenxian shuzhi*，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6。
- 王汎森 Wang Fan-sen，《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Quanli de maoxiguan zuoyong: Qingdai de sixiang, xueshu yu xintai (xiuding ban)*，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2014。
-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Qianchao mengyi: Zhang Dai de fuhua yu cangliang*，臺北 Taipei：時報出版 Shibao chuban，2009。
- 朱軍明 Zhu Junming，《屈大均經世致用思想研究》*Qu Dajun jingshi zhiyong sixiang yanjiu*，廣州 Guangzhou：廣州大學碩士論文 Guangzhou daxue shuoshi lunwen，2011。
- 巫仁恕 Wu Jen-shu、王大綱 Wang Da-gang，〈乾隆朝地方物品消費與收藏的初步研究：以四川省巴縣為例〉“Qianlongchao difang wupin xiaofei yu shoucang de chubu yanjiu: yi Sichuansheng Baxian weili”，《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89，臺北 Taipei：2005，頁 1-41。

- 克利弗德·紀爾茲 Clifford Geertz 著，楊德睿 Yang De-rui 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Difang zhishi: quanshi renleixue lunwenji*，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2002。
- 克斯汀·海斯翠普 Kirsten Hastrup 編，賈士衡 Jia Shi-heng 譯，《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與歷史製作》*Tazhe de lishi: shehui renleixue yu lishi zhizuo*，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1998。
- 吳 超 Wu Chao，〈屈大均、潘耒與石濂交往關係考論〉“Qu Dajun, Pan Lei yu Shi Lian jiaowang guanxi kaolun”，《東方論壇》*Dongfang luntan*，3，青島 Qingdao：2010，頁 100-105。
- 余英時 Yu Ying-shih，《方以智晚節考》*Fang Yizhi wanjie kao*，臺北 Taipei：允晨文化 Yunchen wenhua，1986。
- 林志宏 Lin Chih-hung，《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Minguo nai diguo ye: zhengzhi wenhua zhuanxing xia de Qing yimin*，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2009。
- 林宜蓉 Lin I-jung，〈妖異、魑魅與鼠孽——明清易代攸關家國之疾病隱語與身分認同〉“Yaoyi, chimei yu shunie: Ming Qing yidai youguan jiaguo zhi jibing yinyu yu shenfen rentong”，收入中央大學明清研究中心 Zhongyang daxue Ming Qing yanjiu zhongxin 編，《物我交會——古典文學的物質性與主體性》*Wu wo jiaohui: gudian wenxue de wuzhixing yu zhutixing*，臺北 Taipei：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u，2017，頁 331-381。
- 南炳文 Nan Bingwen，〈《廣東新語》成書時間考辨〉“Guangdong xinyu chengshu shijian kaobian”，《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Xi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6，重慶 Chongqing：2007，頁 74-75。
- 胡曉真 Hu Siao-chen，《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Cainü cheye weimian: jindai Zhongguo nüxing xushi wenxue de xinqi*，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2003。
- ，〈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Ming Qing wenxue zhong de xinan xushi*，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17。doi: 10.6327/NTUPRS-9789863502128
- 高嘉謙 Ko Chia-cian，《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Yimin, jiangjie yu xiandaixing: Hanshi de nanfang lisan yu shuqing*，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2016。
- 張秀蓉 Chang Hsiu-yung，〈論《廣東新語》的經世之學〉“Lun Guangdong xinyu de jingshi zhi xue”，《東吳歷史學報》*Dongwu lishi xuebao*，7，臺北 Taipei：2001，頁 53-83。

- 許倬雲 Hsu Cho-yun, 《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 *Wozhe yu tazhe: Zhongguo lishi shang de neiwai fenji*,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5。
- 郭延禮 Guo Yanli, 《龔自珍年譜》 *Gong Zizhen nianpu*,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shushe, 1987。
- 陳永明 Chen Yong-ming, 《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 *Qingdai qianqi de zhengzhi rentong yu lishi shuxie*,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1。
- 陳澤泓 Chen Zehong, 〈廣東名家修志錄（三）〉“Guangdong mingjia xiuzhilu (san)”, http://www.gzsdfz.org.cn/was5/web/detail?record=101&channelid=298252&templet=gznj_detail.jsp, 2018 年 9 月 18 日下載。
- 魚宏亮 Yu Hongliang, 《知識與救世：明清之際經世之學研究》 *Zhishi yu jiushi: Ming Qing zhi ji jingshi zhi xue yanjiu*,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8。
- 雷可夫 George Lakoff、詹森 Mark Johnson 著，周世箴 Chou Shi-zhen 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Women lai yi shengcun de piyu*,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06。
- 塔 娜 Ta Na, 《清代文學傳播個案研究——屈大均詩文集的傳播與禁毀》 *Qingdai wenxue chuanbo ge'an yanjiu: Qu Dajun shiwenji de chuanbo yu jinhui*, 天津 Tianjin: 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daxue chubanshe, 2015。
- 蒂費納·薩瓦納約 Tiphaine Samoyault 著，邵煒 Shao Wei 譯，《互文性研究》 *Huwenxing yanjiu*, 天津 Tianjin: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2002。
- 趙雨樂 Chiu Yu Lok, 《近來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 *Jinlai nanlai wenren de Xianggang yinxiang yu guozu yishi*, 香港 Hong Ko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7。
- 廖肇亨 Liao Chao-hen, 《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 *Zhongbian, shichan, mengxi: Mingmo Qingchu fojiao wenhua lunshu de chengxian yu kaizhan*, 臺北 Taipei: 允晨文化 Yunchen wenhua, 2008。
- , 《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 *Zhongyi puti: Wanming Qingchu kongmen yimin ji qi jieyi lunshu tanxi*,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2013。
- 劉必琪 Liu Bi-chi, 《屈大均與廣東新語》 *Qu Dajun yu Guangdong xinyu*, 臺北 Taipei: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Dongwu daxue lishixuexi shuoshi lunwen, 2010。

- 劉燕萍 Grace Yin-ping Lau, 〈淫祠、偏財神與淫神——論《夷堅志》中的五通〉
“Yinci, piancaishen yu yinshen: lun Yijianzhi zhong de wu tong”, 《淡江人文社會
學刊》*Danjiang renwen shehui xuekan*, 35, 臺北 Taipei: 2008, 頁 27-53。
- 樊克政 Fan Kezheng, 《龔自珍年譜考略》*Gong Zizhen nianpu kaolue*,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4。
- 嚴志雄 Lawrence C. H. Yim, 〈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
探究〉“Tiwu, jiyi yu yimin qingjing: Qu Dajun yi liu wu jiu nian yongmeishi
tanjiu”,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21, 臺北
Taipei: 2002, 頁 43-87。doi: 10.6351/BICLP.200209.0043

The Diverse Implications of Historiograph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Externalization in Qu Dajun's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Lin I-ju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01long99@ntnu.edu.tw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geography, materiality, and social economy in the evidential learning of Qu Dajun 屈大均 (1630-1696) and his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廣東新語. It also interrogates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spiritual externalization advanced in the work.

The term “externalization” refers to the cultural teaching that begins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d ends with “outsourcing internalization.” In the text, two asp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style and classification” and “narrative traits and discourse strategy.” This study begins by comparing three old editions of the *Guangdong tongzhi* 廣東通志 in an effort to grasp changes in narrative views and the status of “foreign records” (*waizhi* 外志) in these works and reveal what is “unique” and “new” in the style of the *New Discourse*. Second, in contrast to natural history records and the traditional categories found in encyclopedias, the narrative in the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speaker,” and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expression of self-existence and his sense of identity. Through my analysis of these two issues, I elucidate the diverse interests inform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The final objective of the article is to cite Qu's other works and construct a set of “externalized” discourse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rtextual language.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lso outlin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southern overlord” (*nanfang pianba* 南方偏霸) in the text, and sheds light on the diverse implications of historiography during periods of profound change.

Key words: periods of change,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廣東新語, Qu Dajun 屈大均, externalization, overlord

(收稿日期：2018. 10. 1；修正稿日期：2019. 1. 18；通過刊登日期：2019. 5. 14)

